

河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发展研究
姓名：李伟敏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代史
指导教师：牛建强
2002. 5. 1

内 容 摘 要

开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明清时期的开封作为河南省城，一直是河南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在城市建设、经济、商业贸易以及文化等诸方面都有新的发展，所以明清时期的开封城市在开封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开封城市也同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发展大体分为六个阶段，经历了从恢复、发展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趋于衰落的历史进程。明清时期，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开封城市工商业在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中期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景象。这里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城内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各类店铺，一些固定的集市和定期的庙会，还有大量的摊贩。此外，清代中后期，开封城市中还出现了一些商业会馆，这些因素构成了开封工商业的繁荣。这一时期开封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留下了丰厚的文艺作品，充分展示了开封文化的繁荣。此外，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戏曲、曲艺等文化事业的发展，戏曲、曲艺，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使得开封市民的文化生活亦呈现出绚丽多姿的丰采。而明清时期的宗教与祠祀活动则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心态，反映出宗教与祠祀活动对世俗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总之，研究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客观地了解明清时期开封的社会面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开封城市发展，演变的趋势和特点。

Abstract

KaiFeng is one of the famous ancient capitals in Chinese history,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As capital of Henan province, Kai Feng wa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port and cultural centre of He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developed on many new respects, such as construction, economy, commerce and culture, so the Ming and Qing times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KaiFeng. Either Chinese feudal society or Kai Feng appear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features in different period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KaiFeng mainly consists of six periods, experienced the history process from restoration to prosperous and from prosperous to dec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KaiFeng appeared prosperous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middle period in Qing dynasty. There was multitudinous population in KaiFeng. The city had good transport facilities. There was not only many kinds of stores, some markets and temple fair, but also a large number of street pedlar. More over, some commercial guild hall emerged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Kai Feng.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d prosperous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KaiFeng. A large numbers of literati and artist emerg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left over rich and generous literatures and art works, which show the prosperous of cultural of KaiFeng.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and Quyi (folk art forms including ballad singing, story telling, comic dialogues, clapper talk, etc). So the cultural living of residents of KaiFeng appeared rich and colorful features. The activities of religion and sacrifice reflected the mentality of residents of KaiFe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reflected a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sacrifice on the secular living.

In brief,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iFe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not only helpful to our clear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the society features of KaiFe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revealing the tendency and charac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KaiFeng.

引言

城市是历史的产物，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城市以其独特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文化生活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构成皆与农村迥然不同，城市的产生，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集中了较多的人口、生产资料、政治权势、精神文化生活和各种享乐需求等因素，并由这些因素汇合、交织组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集中地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区域范围的社会面貌，并在一定历史时期，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它周围地区渗透影响。因此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①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及近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趋向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城市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社会运动与变革的中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开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明清时期，开封作为省会，是河南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在城市建设、经济、商业贸易及文化等诸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从而使其城市发展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面貌，其间潜藏着的地理特色或内在魅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体会。因此，研究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开封独特的社会面貌，而且有助于揭示明清时期开封城市演变、发展的趋势，有助于探索其独特的发展面貌和特点。关于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发展研究这一课题，已有多人涉及，如单远慕《明代的开封》、《开封史话》，^②孔宪易《试谈〈如梦录〉与明代的开封》，^③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④魏千志《清代开封景文州汴陵庄的发展》，^⑤王兴亚《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⑥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⑦徐伯勇《有关开封历史的几个问题》，^⑧赵宝俊《试论开封之盛衰》，^⑨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⑩等。他们都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对明清时期开封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就明清这一历史阶段开封城市的整体发展面貌上尚未有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人勉为其难，从现存有关开封的地方志及其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P264，人民出版社，1959。

^② 单远慕：《明代的开封》，《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开封史话》，中华书局，1983，3。

^③ 孔宪易：《试谈〈如梦录〉与明代的开封》，《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9。

^⑤ 魏千志：《清代开封景文州汴陵庄的发展》，《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期。

^⑥ 王兴亚：《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⑦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6。

^⑧ 徐伯勇：《有关开封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 赵宝俊：《试论开封之盛衰》，《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⑩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1年。

他相关史料入手，对明清时期开封的发展概况、城市建设、交通、商业、手工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肤浅的探讨，力图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地展现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面貌。

一、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其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开封城市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也同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步，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大体说来，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明初至明成化年间是开封城市的恢复阶段

城市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产物，其发展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繁荣，尤其是农业，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而明初开封周围的广大农村，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和战火摧残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呈现出一幅荒凉、破败的凄楚景象。洪武元年闰七月初，大将军徐达出师汴梁（即开封），进取黄河以北州县，行军途中，从开封到河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①洪武三年三月，开封府郑州知州苏琦在上疏中便指出：“自辛卯（元至正十一年）河南兵起，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②开封作为元末北方红巾军攻取的重地，在战乱中，更是饱受摧残。元至正十七年，刘福通为攻取汴梁，与元将泰不花展开激战，曾纵火烧汴梁诸门城楼，兵燹所至，“有阖门死绝者，其幸存者，咸往它郡避难，自汴以至归、睢、颖、亳、唐、邓、裕州，千里荒芜，人烟断绝。”^③明初的开封的确是“城邑丘墟，人民稀少”，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困境。为了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实现明太祖朱元璋确立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至治社会的治国理念，地方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招徕流民复业，并为其提供耕牛、种子等基本生活资料，奖励垦荒，减免赋税等。洪武元年十月，朱元璋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在给他的上谕中就指出：“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闢，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④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农村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从而为城市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开封作为北宋盛极一时的都城，且由于地处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而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取汴梁（开封

^① 《明太祖实录》卷 33，洪武元年闰七月庚子。

^② 《明太祖实录》卷 50，洪武三年三月丁酉。

^③ 李濂：《汴京杂记》卷 5，物异。

^④ 《明太祖实录》卷 37，洪武元年十二月辛卯。

在元朝称汴梁)。四月,太祖朱元璋就率禁兵数万亲往开封,并声称“尝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亲至彼,仰视俯察,择地以居。”^①五月,“置中书分省于汴梁,以中书参政杨宪署省事。”^②八月,他认为“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联于春秋往来巡狩。”^③九月,又“徙北平在城军民于汴梁”。^④由此可见在洪武初年,开封既是朱元璋北上讨伐残元势力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物资供应地,也是明王朝的两京之一,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定开封为北京的时候,便命在宋代开封里城的基础上修筑开封城池,城周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一尺,皆用砖砌,环城有护城河,深二丈,阔五丈,城辟五门,外建月城三重,又建有角楼四座,敌台八十四座。整座城池坚固、雄伟、壮观,只略逊于南京、北京、西安。当时高大的开封城,在黄河里就能看到,所以于谦的《黄河舟中》诗说:“顺风吹浪片帆轻,顷刻奔驰十数程。舵屋炊烟犹未熟,船头已见汴梁城。”^⑤在修建开封城池的同时,城内亦兴建了各级官署,如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开封府治,祥符县治等,此后又兴建了应祀祠庙、贡院、府学、县学、书院等,城市建设初具规模。至成化年间,开封已是“层城千雉四方中”,“周井有人耕沃野”了。^⑥

(二) 明弘治至明末天启是开封城市发展、繁荣阶段

明代至弘治、正德以后,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商业性农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它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和原料,而且也使某些农民可以抽出较多的时间来经营工商业,这些无疑导致了工商业与农业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及外出从事工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多,必将导致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明代中后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进步以及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地区间经济交往的加强和商业资本的活跃,从而带动了传统城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繁荣。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封这一古老的传统城市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城市人口有所增加,顺治年间所修的《祥符县志》中便称:“明代里甲之广,户口之繁,田土之辟,惟万历年间为盛”。^⑦万历年间,开封已是“万雉云连,屹屹言言,望若列嶂,壮都会也”。登城楼四望,“太行嵩室,居然在几案间,大河汤汤,仅如衣带,”^⑧整座城市“延袤几三十里”。^⑨城市工商业也日益发展和繁荣起来,万历年间祥符人张同德在《西关记》中这样描写开封,“大梁为中原上腴,北咽神京,南控八

① 《成化河南总志》卷12,圣制。

② 《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五月癸巳。

③ 《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元年八月己巳。

④ 《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九月戊子。

⑤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24,艺文11,于谦:《黄河舟中》。

⑥ 《成化河南总志》卷17,集诗,彭纲:《至开封》。

⑦ 《顺治祥符县志》卷2,里甲。

⑧ 《康熙开封府志》卷9,城池,陈所蕴:《增建敌楼碑记》。

⑨ 白愚:《汴国湿襟录》,民存十一。

省，商车市舶，鳞次而西至于大梁门外，联辐接轸，旅邸栉比，居然一都会也。”^①至明朝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开封已成为中原地区一大都会。城墙较明初更为高大完善，高五丈，共有“敌楼五座，俱有箭炮眼，三方四正十六邪。大城楼五座，角楼四座，星楼二十四座，俱按二十八宿布署，样铺十座，窝铺五十四座，炮楼十座，周围四千七百零二丈，垛口七千三百二十二”，城门五座，每座城门外均建有月城，门三重，另又有水门，每个门均有铁裹门两扇。城外的护城河也比明初更宽大，“口宽五丈，底宽三丈，深二丈”。五座城门外的护城河上“俱有板桥，俗名活吊桥。”五门中“曹门通兰阳，宋门通陈留，南门通尉氏、通许，西门通中牟，北门通延津”，此“谓之五门六路，八省通衢。”^②城内共划分为大宁、永安、宣平、安业、新昌、崇仁、惠和、广福八坊；另有汴桥隅、鼓楼隅、钟楼隅、土街隅、西关隅等五隅。此外还有五所、八十四地方。据《顺治祥符县志》记载，明末开封城内“为街者六十有九，为巷者五十有六，而胡同则四十有二。”^③此外城内“又有各府、乡宦花园、书院，玩赏之处，不能枚举。”^④明末开封人口已有37万8千多人。^⑤

此外，明洪武十一年，太祖封其第五子朱橚为周王，洪武十四年朱橚至开封就藩，在城内正中兴建了一座豪华的王府，王城又名紫禁城，“周围三里三百九步五寸，东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⑥城高五丈，上有花垛口，内有拦马墙，城辟四门，门“极大宏敞，碧瓦朱门，九钉九带。”王城内还建有银安殿等宫殿。周王府内还建有豪华精美的园林，内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⑦周藩从洪武十一年建藩，至崇祯十五年完结，计二百六十四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周藩在开封的二百余年间，宗支蕃衍，权势很大，对开封的繁荣与衰败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人王士性说：“周藩最称蕃衍”^⑧，故人称“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⑨明末清初开封人王紫绶便称“天下藩封数汴中。”^⑩正因为周王府宗支蕃衍，所以有明一代开封城

① 《顺治祥符县志》卷6，艺苑，张同德：《西关记》。

② 《如梦录·城池纪》。

③ 《顺治祥符县志》卷2，街巷。

④ 《如梦录·关厢纪》。

⑤ 关于明末开封人口数量，历来说法不一，颇有争议。一说明末开封人口有百万户。如《明史·高名衡传》云：“城初围时百万户”，“城中百万户皆没”。另《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亦云：“开封初受围，阅民得百万户”。《石匱书后集》中称“汴城百万户，悉没巨浸。”上述诸条均谓明末开封有百万户，如果每户以五人计，则人口将达五百万，此说不能令人相信。其二认为明末开封有百万人。如《大梁守城记》云：“初，城中男女百万”，《汴围湿襟录》亦云“（白）愚记清查保甲，阖城八十四坊，王府、乡绅、士民概得一万余户，每户约十丁口，统计得百万余。”此条记载依据统计推算出来的人口数量亦不足为据。其三称明末开封人中数十万。《明史》云“九月壬午，贼决黄河灌开封，癸未城圯，士民溺死者数十万。”此外，《明史纪事本末》78卷、《国榷》卷98均称其时士民溺死数十万。但此数字伸缩性太大，无法给人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行水金鉴》卷45引时任开封推官黄澍的奏疏云：“臣自七月初旬，以点保甲为名，实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相比之下，此数字似比较接近事实，故依此说。

⑥ 《明太祖实录》卷119，洪武十一年六月乙酉。

⑦ 《如梦录·周藩纪》。

⑧ 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

⑨ 汪介人：《中州杂俎》卷1，地理一。

⑩ 《康熙开封府志》卷34，艺文四，王紫绶：《大梁宫人行》。

内除周王府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郡王府第，这些“郡王门第，亦是金钉朱户，琉璃殿宇。宫中皆有内景，郊外皆有花园。”如原武郡王府第，“大门五间，金钉朱户，四门皆有伴当看守。府中殿宇一片琉璃”，府内“地基宽大，殿宇巍峨，金碧精莹”。府内还有山洞楼阁、亭台池塘、花草树木、活水山子，又有桂树百株，隔墙香味扑鼻，池中金鱼长二尺余，“其景世间罕有，布政司匾曰：‘人间天上’。”应城王府，“府内灯殿、山亭，不亚于原武”。柘城王府，“内有山亭、楼阁、花草树木，比原武府尤胜。”^①这些大大小小的亲王、郡王府第及其花园或高大豪华或精巧雅致，代表了明代开封城市建筑的最高水平。

由于开封经济的发展，加上众多的人口，便利的交通，致使工商业也相当繁荣。工商业者或在城内开张店铺，或走街串巷经营摊贩交易，此外城内还有定期的集市庙会贸易，经营方式多种多样，经营的品种繁多，涉及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贵族官绅的奢侈消费品，可谓应有尽有。城内的店铺更是多的难以计数，出售的物品则来自国内各地。店铺里“各色生意，牵连不断”，“大街小巷，王府、乡绅牌坊，鱼鳞相次。满城街市，不可计数，势若两京。”几乎可与当时南、北两京相比。开封城五个城门关厢也很热闹。宋门外有过往客店、竹竿行、羊毛行、皮店。南门外，有“酒饭店、杂货、纸张等铺，过客店排门挨户，生意不亚城内”。曹门外有棉花市、鲜果行，西门外是“八省通衢之地”，有三十五座大店，专住买卖骡马的客商，“两边生意挨门逐户”，^②北门外西厢是旅店和碱店。明末开封人周亮工在为《汴围湿襟录》一书所作的序中便极赞开封“城廓人民之繁阜，宫室舆马之都丽”。^③由此不难看出，至明末开封发展至其鼎盛时期，不愧为富庶甲于中原的一大都会。

（三）明末崇祯至清初是开封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

明崇祯年间，由于政治腐败，赋役繁重，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无立锥之地”，加之自然灾害频仍不断，百姓无以为生，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开封地区自崇祯十二年六月便久旱不雨，至仲秋则飞霜，致使“斗米两金，土贼四起”，“百姓死于饿者凡几，死于饿而相食者凡几。”^④崇祯十三年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饥民从者数万，由于开封是河南省会，中原重镇，所以成为李自成农民军攻取的重点。农民军和明朝统治者在开封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李自成起义军一共对开封围攻了三次，致使开封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率军数万第一次攻打开封，开封城内官民闻警，人人危惧，祥符知县王燮与城内绅衿合谋，于城内八十四坊，每坊议立二社，每社抽门兵三千余，结社固守。城内“周王大发帑金数万，

^① 《如梦录·街市纪》。

^② 《如梦录·街市纪》

^③ 白愚：《汴围湿襟录校注》，周亮工序。

^④ 《光绪祥符县志》卷20，丽藻，马士骥：《汴城围陷记》

鼓舞城守。”巨室大族亦捐货饷，置器械，以助守城。农民军围城，狠攻七昼夜，未能得手，加之明军准备增援开封，于是主动撤兵而去。此次围城，开封“西城一壁陷数处，势不可守。时值饥谨，百姓饿死，道殍相望。”^①官府请周王发内帑数万，修浚城池，两月才告成。至是年十二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第二次围攻开封，起义军共计五十万人马，声势很大。此次攻城，战斗主要发生在北城和东城，异常激烈。起义军用大炮小銃，直对北门城楼，昼夜攻打，使“城壁如筛”。后起义军又用重炮猛攻开封城东北，“于曹门濠边对城扎一大营，督众掘城，拆二丈余一大孔，列大炮十余。一时并击，城垣随声而堕。”^②城内官兵，亦多炮并发，是夜对攻多达数十次，至晓稍歇，开封东北部的城墙被打塌三十余处，城内防守的官兵死守城池，周王大发饷金，重赏守兵，官绅富户亦纷纷捐输，添筑被打塌的城墙，甚至不惜拆牌坊及上方、观音二寺砖石。由于官军死守，起义军围攻二十天后，再次撤退。

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率百万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此次攻城，起义军“围而不攻，欲坐困之。”起义军初至开封，先下令“割四野之麦，一穗靡遗，为久困计。”^③接着分兵四出，扫荡附近州县，把开封孤立起来，加上前来援助的明军又被击溃，故开封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守城官兵只有谨闭城门，严加防守。开封虽为“中州甲郡”，“图书文物之盛甲他藩，士大夫埒富，蓄积充牣。”^④“但在城之民多不积粮。即中人家，亦无担石，而小户穷民，皆乏隔宿。”^⑤围城不久，城内“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矣，”^⑥官府虽组织义勇大社，城内“郡王、绅衿、士民、四方游侠皆至焉”，^⑦但仍无济于事。随着围困时间的延长，城内缺粮日益严重，官军无粮时，竟拿令箭在城里挨门遍户进行搜查，有时一日竟至六、七搜者，且无物不搜，后来则“穷搜亦无矣”。城内百姓“或摘树头青，或买药中饵，或刮树皮为羹，或剜草根，或揆粪中之螬，或捞河中饲鱼小虫，以及皮胶、故纸、涨棉、草之类，无不入口，以延旦夕”。^⑧八月，开封城内已是“十室十空，人始相食矣”。^⑨起初“食死人，死者戒不敢哭。至是，有诱杀、强杀者。九月初，则父子、兄弟更相食，白骨载道。初犹熟食，后，生食矣”。^⑩城内“画栋雕梁，顿成破壁，人家烟绝灶冷，飞鸟远颺绝迹。昔睢阳犹有雀可罗，鼠

① 白愚：《汴围湿襟录》，修城善后。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4。

③ 白愚：《汴围湿襟录》，困城割麦。

④ 《明史》卷267，《高名衡传》。

⑤ 白愚：《汴围湿襟录》，民食告艰。

⑥ 李光璽：《守汴日志》。

⑦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⑧ 白愚：《汴国湿襟录》，秽弃充饥。

⑨ 郑廉：《豫变纪略》卷6，崇祯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

⑩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可掘，今则鼠雀尽无，往史未见。”^①至此，起义军围城已近六个月，城内官兵已到了穷途末路，无法再继续坚守下去了。这次长达六个月的围城，使开封城市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紧随其后的黄河决口则使得古城开封成为泽国，^②经历了“古今未有之苦，古今未有之厄”。

黄河决堤之后，河水从相隔三十里的朱家寨和马家口奔涌而出。朱家寨口“宽二里许，居河下流，水面宽而水势缓”，马家口口子“宽一里余，居河上流，水势猛，深不可测。”^③两个口子里的黄河水，汹涌澎湃，势如山岳，冲到开封护城堤外，合为一，将护城堤冲开一个大口，“直冲汴城以去”，怒浪巨涛，吼声如雷，“水头高丈余，坏曹门而入。南、北门、东门相继沦没。”^④城内皆成巨浸，“水深数丈，浮尸如鱼”，“百万生灵，尽付东流一道，举目汪洋，招头触浪”。^⑤城内只有钟、鼓二楼、周府紫禁城、郡王假山、延庆观及山货店、土街等素称高阜的地方，得免沉溺，全活数千人。此次全河入汴，使开封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开封古都会，富庶甲于中原，竟成巨浸”，^⑥“东京人物尽付茫茫波涛之中矣”，“使数千百年全盛之中区，一旦湮为巨浸，荡为魁

^① 白愚：《汴围湿襟录》，城市邱墟。

^② 关于此次黄河决口淹没开封一事诸书记载各异，争论不休，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谓起义军决河灌城。对此，《明史》中说：“九月壬午，贼决河灌开封。癸未，城圯”，《明通鉴》亦云：“九月，壬午，李自成决河灌开封。”明末曾亲历此事的开封人白愚亦认为是起义军久攻开封而不克，十分恼怒，故而决河淹汴城，他在《汴围湿襟录》一书中云：“贼久困汴，意为必克，不料坚持死拒已及六匝月，守志更坚。贼恨汴甚。见阴雨连绵，秋水大涨，贼挖掘上游，坚塞东、西、南三面堤口，不令水分四溢，止留北面，使全河入汴。至九月十五日，督贼数万将河决开。”《石匱书后集》持同样观点，其书曰：“汴城洼下，濒大河，壮丽而固，贼久攻不下，自成督战，左目中流矢鏃，不得出，遂眇一目。大怒，乃筑长堤属河，决水灌之。会大雨连旬，河水泛滥，汴城百万户，悉没巨浸。”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明王朝官吏决河以淹起义军。对此，《明纪》称：“城傍羊马墙，周王恭枏募民所筑，坚厚如高岸；而贼营直傅大堤，谓河决则贼可尽而城中无虞。”《甲申纪事》则明言为守城者所决：“贼兵姚奇英为余言，……攻开封时亲自扒城，城将破。时官城中者，恐以破城议罪，将河水灌城，而已逃避之。非真河水决也。”《如梦录》一书中亦认为，“时议于狼城岗掘河淹贼，即有奸谗暗画阴谋，假进拒敌之策，实为入城之术。”对此，一种说法认为罪魁祸首是巡抚高名衡。《明史纪事本末》云：“开封城北十里枕黄河，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城守且不支，恃引河水环壕以自固，更决堤灌贼，可溃也。”另一种意见则将河决责任加在推官黄澍身上，《国榷》云：“开封推官黄澍凿渠道之，忽横溢，沦溺数十万，人无不齿者。”还有一些记载把罪责推给河北的援军和巡按严云京。《明纪》云：“会有献计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灌贼。云京以语高名衡、黄澍。名衡、澍以为然。……于是，遂凿马家寨口。”《平寇志》卷五云：“援兵掘朱家寨口。”《绥寇纪略》卷九云：“援师之凿朱家寨口。”第三种观点认为河决开封是天灾。《绥寇纪略》卷九云：“是役也，咈云：‘决河灌贼，不意反为贼所灌。’帝以其孤城死守，泽水天灾，堤决事不复较。高名衡慰劳养疾归，而黄澍召见援御史，寻守汴劳也。”《汴围湿襟录》也说：“按黄河之决，虽起寇祸，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豫变纪略》中亦称：“世传开封之陷者不一。有谓贼决黄河灌之者，非也；有谓官军决河灌贼营而误陷者，亦非也。六月壬子，水仅满壕，城固得其助矣。至于九月，兵民饥饿，不能出城门，乌能一至河干乎？盖开封之陷，天也。”上述三种观点均对河决开封一事进行了分析，但均缺乏有力的根据，且有些说法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不具有强烈的说服力。笔者认为造成此次黄河决口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义军和官军先后掘堤，又包括气候原因，当时大雨连旬，正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次旷古罕见的奇灾。

^③ 《明史》卷84，河渠二。

^④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⑤ 白愚：《汴围湿襟录》，全河入汴。

^⑥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4，河决之患。

陵也”，^①昔日繁华、富庶的开封城市尽付东流，“繁华胜景于此绝矣”。^②

（四）清顺治至康熙初年是开封城市恢复重建阶段

明末清初持续的战乱，使河南地区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一片凋敝景象。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在经历了明末农民军的三次围攻和崇祯十五年那场灭顶的水灾之后，亦是“残闾颓垣，荒榛满目，巷鲜居人”。^③时人马士隲亦称当时是“无城不破，无邑不残，犁锄化为剑戟，沃壤鞠为茂草，蓬蒿塞径，绝犬吠于千村，骷髅盈郊，断炊烟于百里，……独开封巍巍金汤委诸泥沙，官无驻节之地，民无栖身之所。”^④这的确是当时开封残破景象之实录。

社会经济的残破，给人民带来灾难，也使官府“赋税不充”，造成财政困难。为了巩固统治，清廷遂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招徕流民，开垦荒地，整顿赋役制度等，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顺治元年八月，清廷同意将“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为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无力者，官给牛种，三年起科”。^⑤各级地方官员亦根据各地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如顺治五年任祥符县令的胡士梅，到任伊始，“汴尚陆况，村芜野棘，篝火探丸者，遍河南北。”他到任后，每日与当地父老商议疾苦，“遵土著，招流移，安反侧，对开垦，宽催科，减刑罚，行之三年，民始有家”。^⑥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较为有力的措施，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好转，从而为开封城市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

开封作为河南省会，在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城为断壑，池为平原，举当日出政育才建节之地，初以浴鱼龙，继而窟狐兔者几数年矣。”^⑦各级官署亦无处安身，只能驻节他县。城内的市集关梁则“半不可问”。因此，“先修署而次议城，以复汴当日之盛”^⑧便成为急务，但恢复重建工作的繁重亦可想见。清顺治七年，开封知府丁时陞修复开封府治。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提倡属官捐俸，将城堞修整一新，建造各城门及应祀庙宇六座，守城门房十五间。其后巡抚、巡按治所、布政司治、按察司治等各级公署或改建或修复，先后完成了重建与恢复。后又修复贡院、府学、县学、书院等，修复工作一直持续至康熙十二年方才告竣。随着城市各项重建工作的进行，百姓陆续返回，顺治十四年，祥符县编审新入人丁 11788，城市人口有一定的增长。“生聚教养，渐有起色”，^⑨百姓渐次归复故业，开封城市开始走向复兴。

① 白愚：《汴围湿襟录》卷首，周亮工序。

② 《如梦录·著者原序》。

③ 《康熙开封府志》卷 11，学校，李粹然：《贡院记》。

④ 《光绪祥符县志》卷 20，丽藻，马士隲：《汴城围陷记》。

⑤ 《清世祖实录》卷 7，顺治元年八月乙亥。

⑥ 《顺治祥符县志》卷 3，官师。

⑦ 《顺治祥符县志》卷 2，城池。

⑧ 《顺治祥符县志》卷 2，城池。

⑨ 《顺治祥符县志》卷 1，图考。

（五）清康熙中期至嘉庆年间是开封城市进一步发展并走向繁荣阶段

清代康、雍、乾、嘉这一历史时期，是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和经济发展到高度成熟，政治上的相对开明，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经过清初五六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及至康熙中叶，河南的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亦有较快的增长。在农业生产中注意精耕细作，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政府还大力推行高产作物，如蕃薯的种植至康熙中叶已推广至河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棉花的种植更加盛行，河南成为著名的棉产区，并开始有大量棉花输出。乾隆时就有人指出：“今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①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匠籍的废除，使匠户彻底摆脱了政府的人身约束，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进一步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

至康熙中后期，“省会人物渐见阜蕃”，^②开封又发展为“万家烟火”的中原一大都会，“百雉千霄，楼堞坚整，巍然作中原巨镇，而比次环绕数十里至数百里；烟火相望者皆列属之城也。”城内商业活动也日益兴盛。顺治年间，城内已有中市、东市、西市、土市子市、州桥市、揽秀市等几处市集，城外有埽头集等30余个市集。至康熙年间，“城中市廛辐辏处，惟汴桥隅、大隅首、贡院前关王庙、鱼市口火神庙、寺角隅、鼓楼隅为最盛。关厢有五，西关马市街称首，南关次之，大镇店南四十里朱仙镇，商贾贸易最盛。”^③康熙五十七年在开封城东北部建筑了满洲城，城呈正方形，城高一丈，辟东、西、南三门，城楼三座，周围五里一百九十二步，内建官廨六百间，营房二千五百二十间。此后，经过雍正、乾隆年间的治理，城市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又成为中原地区一大都会。而距开封西南四十里的朱仙镇由于贾鲁河便利的交通条件，因此至康熙年间成为“商贩辐辏之区”^④。到乾隆年间，朱仙镇已是“市廛栉比”，成为“水陆舟车会集之所”，南门外贾鲁河沿岸，码头林立，长达五里。朱仙镇输出货物以西北山货，本省牲口与土特产为大宗，输入货物以木材、瓷器、布匹、粮食，京广杂货为大宗。朱仙镇成为河南，乃至华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势如省会开封的外港，与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齐名，号称“天下四大镇”。

随着城市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城市工商业人口迅速增加，商人队伍也日趋壮大，而交通的开辟，使得长距离贩运货易有了进一步发展，造成许多商人异地经商，他们纷纷选择适合自己经营的城镇，从事商业经营，成为侨居的客籍商人。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6，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

^② 《康熙开封府志》卷11，李粹然，《贡院记》。

^③ 《康熙开封府志》卷9，城池。

^④ 朱云锦：《豫乘识小录》卷上，贾鲁河说。

加强同业或同乡间的凝聚力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防止竞争，进一步扩大市场，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是商人们的共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发达城市中便出现了会馆——这一商人的同乡或同业组织形式。开封作为河南省城，是河南的商业中心，也是各地商人汇聚之地，其经济发展虽不及江南发达地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省到此经营的商人也越来越多，便相继集资建造商人会馆。如山西会馆，便是由在开封的山西商人建造的，后改为山陕会馆。此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开封城内又陆续兴建了浙江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两湖会馆等，并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成为开封城市商业繁荣的重要景观。

（六）清道光至清末是开封城市逐渐走向衰落阶段

自清代道光年间起，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走向了日趋衰落时期，进入危机四伏的“衰世”。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封建统治危机四伏。正当满清王朝日益没落之时，正是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全力向外扩张侵略的时期，西方侵略者认为地大物博的中国是他们积累资本，开拓工业品和原料的最好市场，因而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导致了道光十九年（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此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造成了广大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封城市日逐渐走向衰落，而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亦对开封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在祥符县下泛三十一堡之张家湾决口，“水由西至张家湾折而东，坏护城堤，由固门庄分三股直注城下，南门暨东南隅涵洞，由南门溢入，分东西二股，西由城根注西南坡，经臬署、抚署、城隍庙、行宫逾西，北至龙亭、满营，与东水合；东由城根入蔡河折而东北，逾宋门、曹门，经县学、梓潼阁、司备仓、相国寺、七神庙、眼光庙、三官庙、铁塔寺至北门、与西水合。”水灌五昼夜后，城内低处尽满，形如巨湖。城内积水深及丈余，庐舍湮没，人皆露居城上，“肆市尽闭，物价腾贵，有力者买舟逃去”，至二十三日，“水愈大，环城巨浪澎湃，声若雷鸣，人民震骇。”^①“城外之水由于有护城堤内孙李唐庄阻遏，分为三条，“一条正南去，由苏村缺口而出，一条斜趋东南，分溜抵东城下，一条直射西门”。^②河南巡抚牛鉴奏请设宣防局，以司道首府领之，遴选各官分司储峙，募大小船百余只，济渡灾民，运食用诸物进城，飞调河营兵将到城修守，拆城内孝严寺、铁塔寺、校场、贡院之砖以加固城墙。其后，又拆城内公寓的假山石、棚板街石板抛城下，砖石不足则收买民间砖石，或拆毁小巷民房，从东门抛砖连绵不绝，但均不能胜。自立秋后，天云阴惨，大雨滂沱，城内沟塘尽溢，街市成渠。由于城墙浸泡时间太久而不断出现坍塌，或六七

^① 《光绪祥符县志》第6，河渠，黄河。

^②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5，《辛丑河决大梁守城书事》。

丈，或十余丈，情势危及。而河督文冲以城已残破，无庸防守，主张放弃堵口，奏请将省城迁徙他所。但河南巡抚牛鉴及钦差大学士王鼎、署理藩院侍郎慧成则驳斥了文冲放弃堵口、放弃开封的主张，全力防守。全城百姓万余人，各携韦箔、秫旱、布袋、蒲包等，极力堵塞，城始获全。霜降过后，水势稍缓，埽渐稳固，直至次年正月决口才合龙。此次开封被大水围困几乎达八个月之久，再次遭受了旷古罕见的奇灾，“城之西北隅全圯，西及南间断圯，其袤六百丈有奇”。

水灾过后，官府亦进行了灾后的修复重建工作。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重修开封城墙，周长二十八里许，高三丈五尺，较原城墙增高一丈，上宽一丈五尺，底宽二丈，增修女墙高六尺，“重建五门及内西门，升高一丈。宋门涵洞升之三尺，而渠达于惠济河。月城及城楼、庙宇之属，均复其旧。”^①但不久，国内便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清王朝为维持统治，对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内战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也打断了开封灾后的重建工作。河南地处中原，开封又为河南省会，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北兵南调，路所必经，其后为了镇压捻军，大军又麇集于此。在较长时期内，兵差成为河南的巨大灾难。“逐日口粮若干，到处车马若干，少不如意，鞭撻立至”，^②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危害，经济生活深受广泛而严重的灾殃。河南曾为捻军活动之地，兵燹过后，“田亩荒芜，庐井零落，民之颠连而无告者，所在皆是。”^③开封城南的朱仙镇在乾隆年间商贾云集，为“天下四大镇”之一，“商务之盛甲于全省”，^④但至咸丰年间，“皖匪浸肆，前之患水灾者，至是水患寇烬”，^⑤此后，“该镇日形萧索，硕腹巨商无有过而问者矣。”^⑥朱仙镇从此走向衰落，成为四大镇中衰落最早的一个。河南亦“自道光二十八年至今，历年以来，商情艰窘”。^⑦至光绪、宣统时期，城市虽有所恢复，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封建统治者地租剥削的不断加重，加上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使农民经济状况恶化，生产效率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农业收成不断下滑，加速了广大农民的贫困破产，造成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凋敝。农业生产的衰败则又制约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日益衰落。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京汉铁路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南北交通路线大转移，作为省会的开封从此丧失了交通中心的地位，从而日益走向衰落。

^① 《开封市黄河志》，鄂顺安：《重修河南省城碑记》。

^② 《捻军》第5册，P16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③ 《捻军》第1册，P40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④ 龚柴：《河南考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⑤ 宋继郊：《东京志略》，P635。

^⑥ 龚柴：《河南考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⑦ 《河南通志稿》，经政志，河防。

二、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工商业

(一) 城市交通

明清时期，开封作为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地处中原，不仅有四通八达的驿路通往省内各地及全国各地，而且亦有水路与各地联系，交通便利。

明代，为加强京师与地方及各地的联系，设有专门掌管交通邮递的机构，即驿传，其主要负责传宣公文政令、迎送使臣、飞报军情、转运上供物品和军需等。包括驿站、递运所、急递铺。这些机构均根据事务的繁简置备有人夫、舟车、马驴牛骡、房舍等，以供往来公使差人歇宿使用，由所在各布政使司及州县设官管理。开封作为河南省会，设有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一方面，它作为地方行省，要与京师朝廷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它又要与省内各地保持密切联系。明代开封设大梁马驿，由开封府设官管辖，位于府治东北，大梁马驿负责管理属属驿站五十四处，水马驿站、水驿站各一处。又有时和递运所，洪武十七年设，由祥符县设官管理，位于县治东，负责管理递运所十九处。此外，还有急递铺，其总铺设在布政司，下设 32 个铺舍，分成 8 路与开封府属各县联系。这些驿路，不仅只是传递公文、飞报军情的要道，而且也是开封与全国各地及省内各地联系的交通干线，同时还是重要的商道。

明代，开封驿路交通路线主要有下列几条：

1. 从开封府大梁驿向东至大丘驿，共有驿站九，接南直隶宿州百善道驿，路通南京；
2. 从开封府大梁驿向北至釜阳驿，共有驿站七，接北直隶邯郸县丛台驿，路通京师；
3. 从开封府大梁驿向西至鼎湖驿，共有驿站十三，接湖广襄阳县潼关驿，路通川陕；
4. 从开封府大梁驿向南至汝阳驿，共有驿站九，接汝宁府光州，路通湖广；
5. 从亢村驿，向西南至湍阳驿，共有驿站十三，接湖广襄阳县吕堰驿，路通云贵川广；
6. 从卫源驿，向东北至河阳驿，共有驿站七，接口口南驿，路亦通陕川；
7. 从宁郭驿，向西北至万善驿，共有驿站二，接星轺驿，路通泽州山西；
8. 水路自卫源驿，向东北经新镇、黄池，至回隆驿，共有驿站二，接直隶大名府艾家口驿，路通山东。

递运所交通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1. 自时和递运所，向北至磁州递运所，接直隶邯郸递运所；
2. 自和平递运所，向西南至阌乡递运所，接陕西潼关递运所；
3. 自亢村运所，向南至林水递运所，接湖广襄阳县；
4. 自宁郭递运所，至万善递运所，接泽州星轺递运所；
5. 水路自北关递运所，向东北经李家道口至塔河递运所，接直隶大名府艾家口递运所；

急递铺的 8 条路线分别是：

1. 东路：扬州门铺→曲河铺→太平冈铺→接陈留县丰禾铺；

2. 东南路：苏村铺→口湖铺→章田铺→太河铺→祝冈铺→午田铺→接通许县水窝铺；
3. 南路：南薰门铺→侯婆店铺→好草陂铺→朱仙镇铺→刘店铺→闹店铺→接尉氏县卢观铺；
4. 西路：郑门铺→大堤铺→大营铺→接中牟县韩庄铺；
5. 西北路：堰子门铺→双河铺→长店铺→接封丘县于家店铺；
6. 北路：安远门铺→时和铺→张村铺→淳于铺→接封丘县总铺；
7. 县北路：仁和门铺→埽头铺→董盆铺→小黄铺→招讨营铺→接兰阳县白云山铺；
8. 偏东路：陈桥铺→南接兰阳县总铺，西北接封丘县总铺；

通过上述交通干线，开封与南北京及全国各行省都有联系，即使连偏僻遥远的云贵川广也不例外。

开封在北宋时，曾有过发达的水路交通网，号称“水陆都会”，水路主要依靠汴河、惠民河（蔡河）、五丈河（广济渠）、金水河，其中又以汴河居首，是北宋王朝的一条生命线。《宋史·河渠志》便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成会天邑（京城），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指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①

金元以来，黄河的历次泛滥，破坏了开封发达的水运网，对此，明人李濂对开封水系的变迁作了详细的描述：“汴河在今县治南三十五步，即浚仪渠也……。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决祥符之义唐湾，自汴城迤东至陈留、杞县，汴河及堤皆为所淤，而水则入于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黄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庆观前有小砖桥，汴渠故迹微存，俗名臭河儿。”蔡河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的黄河泛滥后湮塞，而不能东达淮泗，“后以其水浅不能行舟，乃立闸以积水。洪武初自里城东南置小木闸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黄河泛滥而河及闸俱被湮废。今南薰门内东西有河，积水弗涸，不复通舟楫矣。”^②五丈河及金水河亦皆因自金、元以来累经黄河泛滥而淤塞不存了。

由此可见，至明代，开封由于屡经河患，泥沙淤积严重，汴河虽未完全淤塞，但已失去通航的能力。至于蔡河，在明洪武初尚能立闸积水以行舟楫，还保留了一定的通航能力，但自洪武三十二年后亦不通舟楫。因此，明代开封的交通主要依靠陆路，但借助黄河、黄河支流及沁河等水道，仍然有水路与省内各地联系。上述河流均设有渡口，可通往各地。^③此外，明代中后期开封城东、南、西、北有五个关厢，因地处城

^① 《宋史》卷 93，河渠三，P2321。

^②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 6，河渠二。

^③ 主要的渡口有：黄河渡口主要有：梁家浅渡，位于祥符县南十五里，路通尉氏县；杏花营渡，在祥符县西南十五里，路通中牟县；白墓子冈渡，在祥符县东南十五里，路通通许县；赤仓渡，在祥符县东南三十里，路通通许县；八角渡，在祥符县西南三十里，路通中牟县。黄河支流上的渡口主要有：陈家口渡，在祥符县东南二十里，善善李渡，在祥符县南二十五里，清水河渡，在祥符县南三十里，路俱通尉氏县。沁河上的渡

关，外来便利，因而也成为交通要道。东关有二，一在丽景门外，一在仁和门外，陆路通南京、浙江、山东；南关，在南薰门外，路通川、广、云、贵诸省，贸易甚众；西关，在大梁门外，路通京师、山、陕；北关，在安远门外，路渡黄河，通临清，入京师之东路。嘉靖年间任河南巡抚的章焕便称开封“内环八郡，外络八州，实天下枢也。”^①开封五座城门的名称亦能反映出其时便利的交通，东门即仁和门，因其路通曹州，故俗呼曹门；小东门即丽景门，以路通归德，归德古宋地，故俗呼宋门。对此，《如梦录》中称开封五门中“曹门通兰阳，宋门通陈留，南门通尉氏、通许，西门通中牟，北门通延津，谓之五门六路，八省通衢。”^②

清依明制，但稍有变化。清初在城内设急递铺，下设铺舍负责对外联系，总铺设在城内布政司东，路线有以下几条：①城外东铺有三，出丽景门→扬州门→曲河→太平堤；②西铺三，出大梁门→郑门→横堤→大营，达中牟县；③南铺五，出南薰门→侯婆店→好草陂→朱仙镇→刘店→闸店，达尉氏县；④北铺三，出安远门→时和→淳于→陈桥，达封丘县；⑤东北铺五，出仁和门→张村→董盆→小黄→埽头→招讨营，达兰阳县；⑥西北铺三，出大梁门→固子门→双河→长店，达延津县、阳武县；⑦东南铺六，出南薰门→苏村→史固→章田→大河→祝岗→午田，达通许县。

驿道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1. 东驿道：出丽景门→高家楼→太平堤；
2. 西驿道：出大梁门→正门口→横堤→大营；
3. 东驿道：出南薰门→芦花堤→仙人庄→老范店→朱仙镇→腰儿铺→闸店；
4. 北驿道：出安远门→野家场→洛里堤→口家寨；
5. 东北驿道：出仁和门→晏台河→南神堤→小黄→招讨营；
6. 东南驿道：出丽景、南薰门→苏村→谷家庄→赤仓→万隆堤→小高庙；

此外，还有驿路通往省外各地，由省城祥符县大梁驿，向东可达江南宿州，东北可达山东曹县，西至陕西华阳，西南至湖广襄阳，南至湖广应山县，北达直隶磁州，西北达山西泽州府。至于水路，因明崇祯十五年的大水，城内河道均已淤塞。清人朱云锦在其《豫乘识小录》中说：“明季屡经河患，淤沙泥甚深，居民有掘土丈余露屋脊者，陵谷变迁。向入城四水（指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今惟贾鲁河分汴之一派，绕省南趋，而城内无一线之流矣。”^③因此有清一代，贾鲁河成为开封对外联系的主要水路。如此位于开封城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因是贾鲁河航运

口主要有：余店渡，在祥符县西北三十五里，路通延津县；柳园渡，在祥符县北二十里，翟家口渡，在祥符县东北三十里，这两个渡口俱通往封邱县。

^① 《康熙开封府志》卷11，学校，章焕：《祥符县儒学记》。

^② 《如梦录·城池纪》。

^③ 朱云锦：《豫乘识小录》卷下，汴城建置说。

的终点，上可通过小舟上溯到京水镇，北与黄河联系，下可达周家口，由淮河通安徽、江、浙，舟楫畅通，因此西北山货由此南输，东南杂货由此北运，于是朱仙镇成为南北货物中转交流的集散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又因接近开封省城，势如开封的外港，故而成为开封乃至河南水陆交通联系要地，成为清初“天下四大镇”之一。

明清时期开封便利的水陆交通，不仅使开封与各地的联系极为方便，也为城市商业和转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商业贸易

开封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商业贸易非常繁盛的都市，故人称“大梁天下之都会也，百货之辐辏也，名商巨贾之聚区也。”^①明初由于周围农村经济的凋敝，开封商业贸易亦很萧条，直至明代中后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发展，开封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明万历年间张同德曾这样描述开封：“大梁为中原上腴，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车市舶，鳞次而西至于大梁门外，联辐接轸，旅邸栉比，……居然一都会也。”^②由此可见，开封作为河南省会，加之地处中原，人口众多，交通便利，不仅吸引了大量省内各地商人来此经营商业，如城内有来自郑州、辉县、光州、固始等地的商人经营米行，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此经营商业，如有来自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的商人在城内各处贩卖不断，因此至明末，开封的商业非常繁盛。店铺、摊贩遍布城内的大街小巷，经营种类繁多，门类齐全，经营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城内有京货、南京杂货、京、杭、青、扬等处运来的粗细暑扇，僧帽、头篦、葛巾、白蜡等货，各样南北鲜果干菜、陈汉章南鞋、四川黄杨木、福建荔枝木梳梳、吉阳夏布、西戎货、俺答香等。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奢侈的消费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由此亦可看出，明末的开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其繁华程度“势若两京”，不愧为“中原一大都会”。

明清时期开封的商业，以店铺贸易为主，此外还有摊贩交易、集市庙会贸易等形式。

1. 店铺贸易：这是广大工商业者经营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其主要特点就是有一定比较固定的店铺。

据《如梦录》记载，明末开封城内外大约有上百个行业，店铺数量更是多得难以数计。仅《如梦录》中有名称的店铺就有 150 多个，包括城中市民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各种行业，能够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③崇祯十五年黄河决堤，繁华的开封城市被

^① 李濂：《嵩渚文集》卷 53，《南园记》。

^② 《顺治祥符县志》卷 6，艺苑，张同德：《西关记》。

^③ 其时城中主要的店铺有：丝店、潞绸店、缎店、机房、棉花店、棉线店、布店、梭布店、织负版、漂白粉厂、染房、碾布店、成衣店、裁缝店、木厂、杉板厂、木器店、寿木店、棺材店、梳梳店、雨伞店、熟皮作

泛滥的黄水吞没，损失惨重。清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封才在一片废墟中重新发展起来。至康熙中后期，开封商业活动亦繁盛起来，市场交易活跃，乾隆年间，开封的商业进一步发展，城内店铺有二十五类，分布在城中的各条大街小巷。据《祥符县志》记载：“市余谷米曰坊子，旧在宋、曹二门、州桥及京山府前，拓城府前，今在东西南北四门及县前街。布帛店旧在西大街、钟楼东、鼓楼北及大隅首东西街，今多在布政司街。巾帕店旧在钟楼东，今多在老府门西及北三圣庙街。冠带店旧在布政司街，今多在南京巷及铁匠口。珠翠店旧在城隍庙会，今多在布政司大街，聚头扇店旧在山货店，今多在布政司大街。笔店旧在开封府东，今多在铁匠口南及北书店街。古书画店旧在城隍庙会，今多在土街及南书店街。铜锡器店旧在布政司街，今多在打铜巷及老府门。箱柜店旧在布政司街，今多在老府门南及河道街。香店旧在鼓楼西及西华门南，今多在各大街。纸店旧在山货店，今多在土街及书店街。旧衣店旧在大隅首东西，今多在徐府街及河道街。陶器店旧在城隍庙会，今多在老府门大街。裘褐店旧在半截街，今多在鱼市口北、东西大街。古樽彝店旧在城隍庙会，今多在土街及书店街。弓矢店旧在弓箭街，今多在老府门北。闺装店旧在城隍庙前，今多在老府门、东大街。杂器店旧在小山货店北街，今多在老府门大街，羹鱼店旧在南门内，今多在五府街。肉食店旧在五隅，今多在鱼市口，瓜市旧在西土街及东南门外，今多在各大街。洒肆旧在五隅，今多在各大街，茶肆旧在茶食王角，今多在各客麻前及街巷口。”^①

明清时期，开封店铺贸易的特点主要是：①布局合理且较分散，营业时间长。明清时期开封这些店铺的分布，已经不再像唐代的长安、洛阳等城市那样，店铺完全被局限在封闭的坊市之中，并且有规定的共同营业时间，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生活的需要，比较分散而合理地分布于开封城内外不同的街巷或地区，而且都是面向大街开设。只是在某些繁华地段的街道上，同一类型的店铺相对集中，而另一些街道则相对稀疏一点而已。至于营业的时间，也完全是根据人们生活的需要来安排的，在那些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街道上，店铺营业的时间一般比较长，有的除日市之外，还有夜市经营，而在那些人口稀疏的街道或地区，则恰恰相反，营业时间较短。

②开张店铺的数量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据《如梦录》及《乾隆祥符县志》记

店、梳梳店、雨伞店、熟皮作坊、皮店、皮局、羊毛店、绒线店、毡货作坊、毡店、西绒货店、银铺、倾销银铺、倾番丝银铺、大倾销铺、打银铺、打锡铺、打铜铺、铁器打制、剪刀、门锁、铸造生铁器、打铁箍、枪刀兵械店、农器、磁器、缨伞、鞞鼓、粉店、磨房、油房、糖店、响糖、烧酒坊、酒店、酒楼、饭店、大米店、杂粮店、元陈店、切面店、素面店、江米店、羊肉面店、鸡鸭鹅店、烧饼店、干鱼店、干鲜水果店、干鲜蔬菜、海菜店、食品店、芽茶店、茶叶店、百样烟火店、竹货店、织竹帘、鞍辔、鞭辔、绳包、丝线带子、首帕、箝桶、定馔、刻字、纸扎、结帽、官帽、纱帽、估衣铺、皂靴店、南鞋店、纳鞋店、城兵快鞋店、袜店、缘条、梳子、腊烛店、风匣方斗店、卤店、画店、揭裱书画页店、翻刻经书店、刷字、刻字、书铺、笔铺、束贴铺、代书店、书束店、纸店、造玉牒册、古董店、生熟药铺、珍宝店、南货店、扇店、手卷店、故衣店、铜锡簪扣店、锁店、漆店、药材店、西药材店、眼药铺、青铜时镜、轴丈、旅店、香料店、网巾、葛巾、皮袄、杂店、胭脂、粉店、针店、山货店、醋店、茶馆、刷子、当铺、诊所、设火丧举、纸马铺、轿店、皮箱、说书、算卦、相面、谈命馆等店铺。

^① 《乾隆祥符县志》卷6，建置志，市集。

载，有些行业，往往有为数较多的店铺在经营，特别是那些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店铺的数量就更多。如为了供应广大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开封城内开设了许多粮店。有六陈行、大米行、杂粮店、粮店、江米店等。城内东西南北四门均有买卖粮食的坊子。有些粮店比较集中，而且日夜贸易。如京山王府前“通是六陈行，买卖日夕不断。”有些粮店经营规模相当大。如县角南之大米行，“所有郑州、辉县、光州、固始等处来各色大米，俱归入行内”，又自税课司往南，是六陈杂粮，“堆囤如山”。清代开封城东、西、南、北四方及城内均有买卖粮食的坊子，由此可见粮食贸易之盛。为了加工各种粮食，开封城内还开有磨房十余家；另有面店、切面店数家，饅食店、粉房、油坊、酒坊各数家，有专售外地运来的菜油、棉油和菜子，芝麻的油店，有专售外地名酒的酒店。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的穿衣问题，开封城内有机房，成衣店、裁缝铺、染房、布房、皮袄店等数十家，此外还有估衣店、故衣店、故衣竿子等多处。另外，还有缝补洗浆衣服者。至于绸缎巾帽、靴鞋、首帕等店，更是随处皆有。此外对醋张家胡同西口往南，通是生熟药铺；东角门外往南，打银铺二三十家；五胜角大街路西，“俱是做妆奁、床帐、桌椅、木器等物”的店铺；钟楼西过街牌坊下有巾帽铺三二十家；相国寺西下马牌往西路南木厂，“卖白松、黄松、桃木之类五六处”；西关建隆厢街北，有大盐店数府，又马市街，有大骡马大店三五十座；北面安远门外吊桥下，“西厢俱有旅店、卤店”；至于酒馆、酒饭馆、酒楼，从城内到关厢，不下几十处之多；封邱王府角，“酒饭各样生意，排门皆是”。

③出现了独具经营特色的店铺。其时，各店铺经营的商品或所从事的专业，相同者固然不少，而独具特色者也不乏其人。如有的店铺专门经营土特商品，有的则专营外地商品。如缎店、潞绸店、京货店、南货店、海菜店、南京杂货、广福店、南酒店、南果店、南鞋店、香店等。有的即使是经营同一行业中，因为服务对象的不同，其店铺也各具特色。如医疗诊所中，除综合型诊所外，还有专治接骨、外科、痘疹、眼科、跌打损伤、修补门牙等专业诊所。旅店中，既有像在安远门外那样专供普通来往客商居住的旅店，也有延庆观等地设备好、地极清幽专供官员、清客、巨商居住的上等旅店。在饮食业中，有比较简易的酒馆、饭店，也有专办喜庆筵席或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宴乐、有“清唱妓女伺候”的豪华酒楼。

④出现了专门经营开封比较有名的手工业产品的店铺。如马道街之定戥有名；又皮匣大箱、冠带帽盒、文具簪匣、七寸枕箱等货，皆是重铜饰件，刷牙篦子、舌抿眉掠灌香精雅，故“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客来，贩卖不断。”

①又许真君祠、八蜡庙一带俱是篦子铺，做毛竹篦子驰名，各地来此进香者多在此买

① 《如梦录·街市纪》。

篦子。灵官庙城根一带妇女生产的各样名鞋，齐家香铺生产的名品沈檀素香，各省驰名。鼓楼西一带各店出售的土产杂货，天下客商来此贸易者，“每日拥塞不断”。相国寺桥的糖果驰名第一，又有高牌纸店，光花雨旱纸伞、铸造生铁器，各省驰名。

由此可看出，明清时开封城中店铺众多，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行业，五花八门，城中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应有尽有，充分反映出开封商业的繁盛。

2. 摊贩交易

明清时期开封城内除了有许多有固定店址的商铺之外，还有大量流动的小商小贩，即摊贩交易。这种交易与店铺贸易相比，它没有固定的店铺，资本较少，规模较小，但因其采用的方式较为灵活，便利群众生活，是店铺贸易的重要补充。这类商贩，按其经营情况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集市上的小商贩，一种是走街串巷，甚至登门入户的小商贩。据《如梦录》记载，明末开封城内的小商贩极多，“其大街小巷，不记其数，俱是小生意。”^①经营的品种亦非常丰富。如蓝家胡同过口，亦是三街六市，除正规店铺外，有“烧黄二酒、火烧、烧饼、牛驴肉车，饭食、粗馕，南至县角，四面皆卖布故衣，有老妇人替人缝补衣赏”。在大相国寺，“每日有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大门东，有老妇人与人浆洗衣服，缝缝补绽，热闹无比。”^②察院东大旗杆照壁前，卖大米粥、粽子、油粉、铜货摊子。钟楼西过街牌坊下路西卖灌香刷牙簋子，垂头舌抵、耳勺、耳簪、帽靴、鬃刷、皮箱、描金卷胎漆盒，路南买首帕、黄黑雨伞、香铺、合香、攒香、俺答香、香袋、连笼、桌围等物。张仙庙广生殿门内，俱是卖金鱼、银鱼、火眼三尾鱼秧等项，鱼甬、鱼盆、铁篦、虫兜等物，飞禽、鸣鸟、百灵、卑花、画眉、黄雀、鱼蓝、鹌鹑、猫犬之类，诸样丝网、鹌鹑哨子、明笼、竹笼、滚笼、串袋等物。

至于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手艺人，更是随处皆是。开封城五门关厢“各口有货郎、卖白布、花素、生缣、青蓝布、小机包葛、绒羯、毡毯、各色夏布、绵绸、山缣。又有惊闺、惊绣、洗镜、定剪、磨刀、补锅、定盘、定碗、定秤、张罗、劈柴、铡草、纳鞋、拴扎鞍架等扯络鞭子。又有炒栗、密果、十香茯苓糕、烧鸡、鸽、雏皮鱼乍、鸡鱼乍、瓜子、咸豆、猪头熟货、牛羊驴肉车、各色果品、诸样瓜瓠。”且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所卖货物又有变化，上元之时，卖百般花灯，“春间来卖诸色野味，谷雨时买谷帖，天中时卖天师、艾虎、硃砂、雄黄、献艾、菖蒲、油嫩、粽子、百锁、排线。五六月卖老鹳扇、响竹、凉枕、蒲席、各处暑扇、葛巾、西瓜、甜瓜、山药、莲藕。中元节，卖烧纸、金银。中秋节，卖石榴、毛栗、梨、桃各样鲜果、祭品等物。九月重阳节卖菊花糕。十月朔旦、经盘寒衣。腊月请灶神、黄线、吊麻、百事大吉、葫芦匙儿、门神、对子、青松、石竹、香、虾、蟆、蜡、签、瓦、香炉、蜡台、发面酵子、

^① 《如梦录·街市纪》。

^② 《如梦录·街市纪》。

绵纸、毛纸、太盐、小盐、芥末、姜、蒜、各种乾果、茶食盘、馓、棉布手巾、棉线带子、通草花儿、五彩绒花儿、剪裁零碎、故衣竿子、跨护领筒、绫罗缎绢、头条牙子、绫纱护领、挽袖、眉柱、焯灯盘、香羊油烛、百草疼痛膏药物。”^①

至清代康、乾年间，开封城内商业繁荣，城内挑担或推车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多不胜数，据乾隆年间《祥符县志》记载，“有摇小鼓两旁自击，卖簪珥女弄胭脂胡粉之属者，有鳞砌铁叶进退有声，磨镜洗剪刀者，有摇郎当卖彩线绣金者；有小旗招占携中箱卖零星缯帛者，有阁阁拆声执杓卖油者，有拍小铜钹卖豆末者，有驱轆轳小车卖蒸羊者，有煮豆入酒肆，撒豆胡床以求卖者，有挑卖团圆饼、薄夜、牢丸、毕罗、寒具、萧家馄饨、康家庾家粽子如古人食品之妙者；有肩挑卖各种瓜果菜者，有入夜击小钲卖饧者；有悬便面于担易新者；有求残金笺扇等器熔出金者；有买肆中柜底土及掏市沟刷街泥以搜钱银屑者；又有攒花于筐璨然锦色卖与人种植者，往来梭织，莫可殚纪。”^②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开封城内这种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很多，其经营的商品大多与城中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采用的经营方式又较为灵活，因此这种摊贩交易在当时非常活跃，它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人们提供各种便利，在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3. 集市庙会贸易

明清时期开封城内外的集市和寺庙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商业活动场所，从而形成了集市庙会贸易形式。

明中后期，开封城内的集市主要有6个，即中市，在城隍隅头；东市，在城鼓楼街；西市，在城钟楼街；土市子市，在城土街；州桥市，在城南薰门街；揽秀市，在城大梁门内。开封城外集市共有30个，分布在城市的东、南、西、北四面。^③

至明末，开封城内外除了有这些固定商业场所的集市外，还有专项经营某一类商品的专业集市，如仁和门外便有专营棉花的棉花市以及专营鲜果的鲜果行。大梁门外西关附近有专营蔬菜零售、批发的集市，“五更时鲜菜成堆，拥挤不动，俱有贩者来买，灯下交易。城门开时，塞门而进，分街货卖。”西关马市街“早晨牛驴上市，午间骡马上市。”^④

^① 《如梦录·小市纪》。

^② 《乾隆祥符县志》卷6，建置志，市集。

^③ 城外集市有：埽头集，城东40里；讨营，城东45里；太平堽集，城东30里；王家楼集，城东45里；薄酒店集，城东30里；关头集，城南35里；朱仙镇集，城南15里；赤仓集，城南30里；水坡集，城南60里；大高庙集，城南30里；小高庙集，城南60里；闹店集，城南60里；刘村集，城南60里；八角店集，城西30里；瓦子坡集，城西35里；杏树集，城西60里；狼城堽集，城西40里；高坡集，城西30里；陈桥集，城北40里；刘光集，城北10里；曹堽集，城北50里；黄陵集，城北70里；平近集，城北；沙堽集，仓集，城西南20里；八里湾集，城东40里；初村屯集，城北50里；荆隆集，城西北40里；店李家口集，城西。

^④ 《如梦录·关厢纪》。

清代康熙年间，开封城内集市贸易再度复兴，“城中市廛辐辏处，惟汴桥隅、大隅首、贡院前关王庙、鱼市口火神庙、寺角隅、鼓楼隅为最盛。关厢有五，西关马市街称首，南关次之，大镇店南四十里朱仙镇，商贾贸易最盛”。^①至乾隆年间，城内有专业集市8处，分别是：猪儿市、西关牛马市、西门杂粮市、南门杂粮市、曹门杂粮市、北门杂粮市、宋门棉花市、曹门花线市。城外集市更有埽头集、薄酒店集等54处之多。

庙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集市贸易形式，因其集场一般在寺庙附近而得名，其最初是专为祀神而设，为善男信女提供香纸、食品等商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贸易百货的大型集市，每逢会期则摊贩云集，贸易甚盛。寺庙本是宗教的活动场所，但至明清时期，它已成为特定的公共集会场所，且又有以时举行的约定俗成的宗教祭祀活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赶庙”，于是寺庙这种非官非民却凝聚人气的地方，便成了商业活动渗透的空间。庙会也由此具备了宗教与商业的双重性质，并逐渐被人们称作“庙市”。庙市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以其独特的凝聚力，聚集起数量最多的中下层城市居民，此外，它较肆市不仅在贸易上更为自由，而且从参与者的成分看，更具有广泛性，它吸引了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因此明清时期庙会贸易有了迅速增长，吸引了众多的工商业者来此进行经营活动。

如明末城内的东岳庙庙会，“每年三月廿八日，圣诞之辰。五日前会起，进香做醮，拥塞满门。所卖各样货物，遍地皆是。棚搭满院，酒饭耍货，诸般都备，香火燎天，人烟盖地。”又城隍庙每逢初一、十五大会，“各处进香拥挤盈门，”城隍庙照壁前，“卖牛马尾网巾、唐巾等货。牌坊下，卖描金彩漆、卷胎、拔丝等盒，帽匠盥洗旧帽，安鞭瓜，兼补破坏。东角门外，卖桌椅、床、橙、衣盆等架，大箱、衣箱、头面小箱、壁柜、书橱、一切木器。西角门外，卖轩辕镜、菱花、穿衣、锦背、各色古镜、青铜时镜、粗细芽茶、玉容官皂。鹿角外，卖锡器，各样走铜山水器皿等货，两边尽是嫁妆之物，大小竹货，莲桶、莲缸、珍宝古玩、杂货摊子。大门下，卖油簪、油糕、煎饼、蒜面、扁食、油粉、酥糖等食物。甬道上，卖绒线、翠花、珍珠、珊瑚，各样银器杯盘，零剪绸缎，诸样头条、汗巾。东角门内，卖时鲜干果之类；西角门内，卖梳枕竹篦，假银生活等物。二门东角门内，摆设名琴、古画、犀、玉、玛瑙、杯器、炉瓶器皿，貂鼠、海獭、虎、豹、鹿、麂、狐、貉等皮。甬道上，卖灌香刷牙篋子、舌抵、眉掠、修补门牙、香袋、香笏、扇囊、盛香等物。西角门下，卖旗皆是彩帛制的，南丝带、各处汗巾。西丹墀，卖绒羯毡毯、葛夏布匹，各样鞋铺。庙台上油靴、油鞋、泥屐、雨伞铺；台儿上，俱是男女缎靴；月台上，卖各色梭布、小机等布。东丹墀，绸缎故衣、首帕等铺。甬路北头，卖笔、墨、砚台，南京草履；周围廊下，俱是小书、时画、圣像、故衣竿子、卖药、算卦、僧道化缘。大门外，南抵按察司墙，尽是卖果木、茉莉、建兰、梔子、砂甌、砂盆、磁绣墩、花

^① 《康熙开封府志》卷9，城池。

头，卖笔、墨、砚台，南京草履；周围廊下，俱是小书、时画、圣像、故衣竿子、卖药、算卦、僧道化缘。大门外，南抵按察司墙，尽是卖果木、茉莉、建兰、梔子、砂甌、砂盆、磁绣墩、花罇、小轿、骨花、抽挪大轿、十景花盆。往南街东，小书、时画、算卦、相面、戏术、篦头、修脚之类。街西，销金法衣、道衣、打银铺二三十家，卖宝器、珍珠、翠花铺、打红铜各样器皿，直至六府角。”^①由此不难看出，明末开封的庙会贸易已成为一种主要的贸易形式存在，给广大市民的生活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至清代，庙会贸易也随着城市的恢复、发展再度兴盛。以清乾隆年间开封为背景的小说《歧路灯》中形象地描述了禹王台庙会的情景，“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始于师旷，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唐时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游咏其上，所以遂成名区。上边祀是夏禹，都顺口叫做禹王台。每年三月三日有个大会，饭馆酒棚，何止数百。若逢晴朗天气，这些城里乡间，公子王孙，农父野老，贫的，富的，俊的，丑的，都来赶会。就是妇女，也有几百车儿。这卖的东西，整绌碎绌，新桌旧椅，各色庄农器具，房屋材料，都是有的。其余小儿要货，小锣鼓，小枪刀，鬼脸儿，响棒槌之类，也有几十分子。枣糕，米糕，酥饼，角黍等项，说之不尽。”庙会上的货物堆积如山，种类也非常齐全，最多的是食品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为了吸引更多群众赶会，庙会一般都会唱几台戏，还有游艺表演。禹王庙大会也不例外，有戏曲演出，还有杂技、魔术表演，节目内容都是百姓百看不厌的，吸引了众多观众，“早望见黑鸦鸦的，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好不热闹。但见：演梨园的，彩台高檠，锣鼓响动处，文官 笏，武将舞剑。扮故事的，整队远至，旗帜飘扬时，仙女挥尘，恶鬼荷戈。酒帘儿飞在半天里；绘画着吕纯阳醉扶柳树精，还写道：‘现沽不赊’。药晃儿插在平地上，伏侍的孙真人针刺带病虎，却说是‘贫不计利’。饭铺前摆设着山珍海错，跑堂的抹巾不离肩上。茶馆内排列着瑶草琪花，当炉的羽扇常在手中。走软索的走的是二郎赶太阳，卖马解的卖的是童子拜观音，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弄百戏的弄的是费长房入壶，说评书的说的是张天师降妖，端的夸不尽武艺高强。绫罗绸缎铺，斜坐着肥胖客官。骡马牛驴厂，跑坏了刁钻经纪。饴糖炊饼，遇儿童先自夸香甜美口。铜簪锡钮，逢妇女早说道减价成交。”禹王台庙会的热闹吸引了很多人来此赶会，男女老少，摩肩接踵，真是万民同乐，“龙钟田姬，拈瓣香呢呢喃喃，满口中阿弥陀佛。浮华浪子，握新兰，挨挨挤挤，两眼内天仙化人。聋者凭目，瞽者信耳，都来要聆略一二。积气成雾，哈声如雷，亦可称气象万千。”^②

由此可见，此时的庙会已不仅是物资交流大会，也是群众娱乐的阵地。禹王庙大会的热闹与交易的旺盛，可视为乾隆间开封商业繁荣景象的缩影。

（三）明清时期开封的手工业

明清时期开封的手工业主要包括官营和私营。明清两代均设织染局管理官营手

^① 《如梦录·街市纪》。

^② 李绿园：《歧路灯》，第3回。

工业。明末开封城内和关厢散布着各种官私机房和小手工作坊，主要的作坊有：纱帽铺，专做王侯、大小文武官员冠巾，金、玉、犀角、玛瑙、乌角等带并女冠等类；机房，织包头、首帕、素缣、裱绫、画绢、罗底等货；皂靴铺，定做选材通衬文武官样，四缝掐金男女朝靴，鍍匠胡同南的作坊，鍍各样巾帽盔，及各色器用，城内钟楼西一带有帽巾铺三二十家，定做百样巾帽；大倾销处，专做上纳元宝、大小成鍍；结帽匠，专结牛马尾各样巾帽；城内北门大街萧墙一带居民，多业熬盐；铁器铺，铸造生铁器；静一打银店，专一打龙凤花草、山水人物，瓮嵌螺丝，干贴真金，管化十成；篦子铺，专做毛竹篦子；兵器铺，打造盔甲、什物、枪刀、剑戟诸样兵械；五道街中第二道街内是机房，所织有花素生缣，乌绫包头，秋罗、长绢、护颈等货。此外还有鞋店，做各样名鞋，布袜店等；仅染房，就有十几处，分布在开封城内各处。城外宋门一带俱是砖瓦窑，做砖瓦、兽头、鸱尾、勾檐、滴水、狮子巴砖、琉璃等货。在城内西部一些较僻静的街道上还有几座“回回”开设的皮局，他们“硝熟各种皮张”，进行制革，这是开封的一种闻名全国的传统手工业品。此外明代周王府内有刻书籍及镌金石“墨刻作”等。各郡王府、各衙署、各缙绅府都觅雇了一些刻字工作，各街巷开设着大大小小的刻书铺，当时“周藩”所刻的各种书籍在海内外尤负威名。

明末开封的手工业大多为作坊经营，规模不一，有些仅靠本人和家属参加劳动，一些资本较多，经营规模较大的作坊也雇短工，《如梦录》中就提到土街角有短工市，可作为有些作坊雇工的旁证。这些机房、作坊、皮局、砖瓦窑、刻书局等手工业，形成了明代开封手工业的繁盛。

明末崇祯十五的水灾及明清之际的动乱，使得开封的手工业遭到了重创，各种作坊至清初时都已无存，手工业一片空白。直至康熙末，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手工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至乾隆年间，开封手工业兴盛起来。官手工业有设在县署西北的织染局，生产产品只供官府所需。民营手工业有绸缎、布、染、熟皮、磁器、木器、纸、鞞货、制酒、制药、琉璃砖瓦、制铜铁器等行业。最发达的手工业是丝织业，建于明末清初的景文州汴绫庄，是开封丝织业有代表性的民营手工业。开封景文州汴绫庄的发展，可视为清代开封手工业发展的一个侧影。“汴绫”是开封传统的丝织产品。乾隆《祥符县志》中说：“《宋史》及《文献通考》云：开封祥符贡方文绫。今汴绫似缙差薄，而光亮乃其遗制。”^①景文州汴绫庄便以生产汴绫而出名。开封景文州汴绫庄的创始人景文州，原籍山西洪洞，是一个以贩卖丝绸、丝带、绒线为业的小商贩，懂得一些丝织方面的手艺，明末清初时迁居开封，在开封定居后，资金逐渐积累，遂创办汴绫庄，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其初本人和家属都参加

^① 《乾隆祥符县志》卷2，地理，物产。

劳动。得到一定发展后，就完全雇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过百十年的经营，到乾隆年间，景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九十九张织机、专靠剥削雇工牟利的大作坊主了。景文州汴绫店的整个组织分“柜上”和“后作”两部分。“柜上”是负责经营、管理的部门，负责全面的经营管理工作，从购进原料到批发、零售产品。“后作”是生产部门，负责后作的一切生产事项。作坊的生产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络丝、牵经打纬、织货、练染等几个部分。景文州的作坊中，生产过程已分成许多独立的操作，已经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所用的工人有月工、年工、学徒工三种。到乾隆时期，景文州汴绫庄的发展趋向鼎盛，当时有织机九十九张。每张织机例需织工二人，再加上一些辅助劳动者，总计工人当在二百名以上。

景文州汴绫庄之所以能在清朝前期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店铺，一跃而成为开封首屈一指的大作坊，不仅与当时全国的形势有关，而且与当时开封的具体历史条件密不可分。首先，随着清朝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到康熙末年，社会经济不仅已得到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巨大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都有相应的发展。这种全国性的经济繁荣，为景文州汴绫庄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其次，开封在明崇祯十五年水淹之后，手工业一片凋零，这次洪水不仅吞没了开封原有的工商业店铺，而且也冲垮了开封旧有的行会势力。这些都为景文州汴绫庄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它能够在迅速占领市场和迅速扩大经营规模。^①

（四）清代开封城市中的商人会馆

会馆之称，出现在明代，原并非为商人所专设，故其性质也不一样。这里所说的清代开封城市中的会馆是指在开封城内从事经商活动的外籍商人或主要是外籍商人所建立的会馆。这种会馆，是与清代开封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以建筑的形式，记录了外地商人在开封经营活动的足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清代开封商品经济发展的面貌。

会馆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人口迅速增加，异地经商成为一种趋势。各地商人纷纷选择适合自己经营的城镇，从事商业经营。这些异地的商人来到某一城镇，经过一段时间经营之后，逐渐与当地乡绅和商人发生矛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展自己的经营，他们纷纷通过建立会馆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于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率先出现了会馆。

开封是河南省城，是河南的商业中心，也是各地商人汇聚之地。从清顺治年间开始，各地在开封经营的商人，相继集资建造商人会馆。位于今徐府街的山西会馆，是由山西商人在开封建造的会馆，其创建的确切时间，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目前尚不

^① 上述内容参考魏千志的《清代开封景文州汴绫庄的发展》，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期。

清楚,但据资料分析,最早早不过清顺治年间,最晚晚不过乾隆三十年。山西会馆后来又称为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这说明原来作为山西一省同乡组织的山西会馆,后来又逐步扩大为西北三省(山、陕、甘)的大同乡组织了。整座建筑,坐北向南,建筑豪华,规模宏伟。今日尚保存有一部分建筑物,即会馆前部的关帝庙部分。据嘉庆十七年《山陕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所载:此关帝庙初建时,“接檐香亭五间,旁构两庑,前起歌楼,外设大门。庙貌赫奕,规模闳敞。繁逢圣诞,山陕商民奉祭惟谨。”^①此后又不断地扩建、修葺。嘉庆四年进行重修。道光四年,神殿扩建,次年又增建六柱五牌楼一座。道光十四年又重修牌坊。经多次修葺,会馆建筑日臻完善,形成一组壮丽的建筑。整个建筑群建筑面积达1882平方米。其平面布局采用了我国传统的沿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形式,在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排列照壁、戏楼、牌坊、正殿(拜殿、卷棚、后殿组合而成)。中轴线的两侧对称排列翼门、钟鼓楼、配殿、跨院等。整个建筑空间以戏楼、正殿为核心,为乡聚、合乐、议事之处。左右的附属性建筑与中轴线平行,通过垂花门与主院相通,形成似隔非隔、隔而不断的建筑空间组合。建筑风格富丽堂皇、精美华丽,体现出商人喜好铺张奢华、繁缛喧嚣的审美情趣。山陕甘会馆的建筑装饰技术更是绚丽多姿。庑殿顶、重檐歇山顶以及兽吻、斗拱等的采用,突出了建筑物的华贵。尤其是遍及梁柱间的彩画,以及荟集于照壁、檐桁间的砖雕、石雕和木构件上的木雕,以其内容丰富的题材和淳熟精彩的刀法闻名。山陕会馆的出现,可作为清乾隆年间开封城市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佐证。会馆建筑的宏伟、豪华,也反映了山陕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资本的雄厚。

伴随着开封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馆也不断出现。“会馆乡祠在西门街,浙江人公建祀神饮福之所,国朝康熙二十年监生王安福建。康熙五十八年司狱丁震宣等修。雍正六年侯选知州周文德拓修。……余名省会馆多隶祥邑。”^②由此可知其时开封城内会馆较多。如浙江会馆,位于今财政厅东街路北,乾隆年间由浙江人何恭慧、章继辉发起创建。光绪年间,浙江人廉晋省集资在会馆前院加盖群楼罩棚、戏台,并扩充西院房舍一所。覃怀会馆,位于菜胡同路南,于嘉庆十七年由在开封的怀庆府九县商人集资筹建,光绪十八年,大药商同仁中、同仁福捐资修大殿一座,陪廊各两楹。福建会馆,在今理事厅街,乾隆年间由林义兴、谢开泰发起。江苏会馆,由道台邹鸣鹤捐资修建。两广会馆,在学院门街,道光年间由广东人张厚巷、杨掇香等八人倡议修建。安徽会馆,在今双龙巷路北,建于道光年间。两湖会馆,在今省府后街,建于咸丰七年。山东会馆,在今省府后街,曾于光绪三年重修。云贵川会馆,在今大袁坑沿街路,为云南人赵金波集资创建。汜水会馆,在菜胡同路南,由在开封经营商业的

^① 王兴业:《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② 《乾隆祥符县志》卷8,祠祀。

河南汴水商人集资，于光绪三十一年修建。陈州会馆，位于大厅门街路南，是由寓汴的淮阳、西华、项城、商水、沈丘、太康、扶沟人集资建立的。据光绪年间《祥符县志》所记，至光绪年间，开封城里的会馆有以下各处：山西会馆、浙江会馆、盐梅会馆、两湖会馆、安徽会馆、山东会馆、江苏会馆、两广会馆、云贵四川会馆、江西会馆等。^①由此可见，开封城内会馆星罗棋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开封城市中商人集团实力的增强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文化生活

明清时期开封虽仅为一省会，但由于它曾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加之地处中原，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故历来被人们称为“人文渊薮”。顺治《祥符县志》中就说：“汴居天中，夙称人文渊薮，汉邹枚、司马诸君子珥笔平台，摘华梁苑，已登作者之堂嗣，及唐宋而名公巨卿，无不翱翔其间，骚人墨客，且登高作赋，遇物能铭矣。”^②明清时期，开封涌现了大量的文人学子，活跃在开封文坛上，他们或工于诗文，或精于考证，或肆力著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了这些文人学子外，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商业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广大市民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状况，推动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对广大的城市居民来说，文艺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权贵势要与富商巨贾自不待言，广大城市中下层平民，他们在辛勤劳动之余，也非常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娱乐生活来做些调节。为满足城市中不同阶层人们的这种要求，明清时期开封城市中不仅出现了专业艺人，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其中有专事说书弹唱者，有的则以善于演奏乐器而驰名，如邳州汤应曾，以善弹琵琶著名大梁（即开封）间，人称之为“汤琵琶”。^③此外，明清时期开封城市文化繁荣的另一个主要方面表现在戏曲文化的发展，戏曲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创作及广大艺人的长期实践与创造，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剧本、剧作家及知名艺人，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

（一）明清时期开封的文人及其著述情况

明清时期，开封文坛上人才辈出，前后相继，据明清时期开封地方志中有关资料作一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开封籍文人多达 115 位，他们之中有明初著名戏曲家朱有燬、正德、嘉靖年间文学巨匠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高叔嗣、田汝耘、李濂、左国玠、王惟俭、和春、李士允、以及万历年间周藩著名文人朱睦㮮、朱安侃等，此外还有明

^① 《光绪祥符县志》卷 1，舆图志，城图。

^② 《顺治祥符县志》卷 6，艺苑。

^③ 张潮：《虞初新志》卷 1，《汤琵琶传》。

末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清代著名诗人王紫绶、汉学大家倭仁及宋继郊、常茂徠等，名人辈出，不胜枚举，其简介及著述情况可参看《明清时期开封籍文人著述情况一览表》。他们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包括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考据学、戏曲创作、医学、书法、绘画等各个方面，且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开封文化的繁荣。

开封人杰地灵，明代开封文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明初著名戏曲家朱有燬、正德、嘉靖年间的李梦阳、李濂、以及万历间周藩著名文人朱睦㮮、朱安侃等。

朱有燬（1376—1439），号诚斋，周定王朱橚长子，谥称周宪王，博学善书，尤工词曲，善北杂剧，是明朝有名的戏曲作家，著有《曲江池》、《义勇碎金》、《香囊怨》等杂剧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他的作品之多，仅次于元代的关汉卿，传本之备，又胜于关汉卿，是由元至明杂剧作家中作品保存最多的一个人。其作品鲜明地表现出贵族立场，处处散发出浓重的宫廷气息。他极力摹仿关汉卿，安排戏剧场面讲究变化，遣用文词比较本色，而且音律谐美，易于付诸舞台，有较好的演出效果。他的作品在当时极有影响。明代大诗人李梦阳的《汴中元夕》诗中曾说：“中山孺子依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①可见在当时开封一带，朱有燬的杂剧风行一时。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中也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萧王光武》、《蔡伯喈》、《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②这里所说的《继母大贤》即为朱有燬的剧本，可见此剧在当时很流行。万历间焦竑亦说：“（周宪王）所制乐府新声，大梁人至今歌舞之”^③。《列朝诗集》谓诚斋所“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④

李梦阳（1473—1529），字天赐，后改献吉，号空同子，生于陕西庆阳。他十岁时，其父任周王府教授，遂“徙居大梁”。少年时就因古文诗赋，“为文即迥出流辈同业”，被开封人目为李才子。弘治五年，李梦阳中陕西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第，观政通政司。不久因其母高太宜人病逝，李梦阳扶柩归大梁，权厝城北寺，并在寺中读书。其后在开封授生徒，学者及门人甚众。直至弘治十一年，李梦阳离开开封，前往京师，被授户部山东司主事。正德元年，李梦阳因上疏弹劾权阉刘瑾，被致仕。次年，李梦阳回到开封，“筑河上草堂，起翛然台于后圃、需于堂于草堂之南，闭门却扫，课子弟，聚生徒，怡然终日，不履城市。…暇日撰杖脂车，游苏门山，登啸台。”^⑤正德三年，

^① 李梦阳：《空同集》卷35，《汴中元夕》。

^② 叶盛：《水东日记》卷21，小说戏文。

^③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周宪王朱有燬》。

^④ 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周宪王朱有燬。

^⑤ 《空同先生集》卷67，附录一，朱安侃：《李空同先生年谱》。

刘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乃免。”^①此后两年，李梦阳闲居开封，“移居东角楼，始自有家室。”^②正德元年，诏起为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但此后又因宁王宸濠之事被罢官。正德九年，李梦阳回到开封，“既家居，益趺驰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此后，李梦阳除外出游玩外，一直居住开封，吟诗作赋，留下了大量的诗赋作品。《明史》称李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③隆庆年间开封著名学者朱睦㮮认为：“弘治间，北郡李公献吉与何、徐诸公始变文体，力追元古，务去近代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拟汉魏兼法盛唐，海内学士大夫翕然趋之，诚一代之宗工也。”^④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⑤这种说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梦阳也因此成为明代中叶文学复古派的前七子之首。与李梦阳同时代的另一位河南籍大文学家何景明对他大加赞赏，称其“李子振大雅，超驾百世前。著书薄子云，作赋追屈原。”^⑥

李濂，字川父，号嵩渚山人，是明嘉靖年间开封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他自幼“颖敏好读书”，九岁便工古文。曾作《里情赋》，“友人左国玘持以示李梦阳，梦阳大嗟赏，访之吹台，濂自此声弛河洛间。”^⑦正德八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后迁宁波同知，累迁山西按察司佥事，后因“坐忤权贵，嗾言者论罢。”^⑧嘉靖五年，李濂政仕，返归故里，归年甫三十八。李濂罢官归家后，自筑室于汴，名曰学稼堂，一方面，“益肆力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⑨另一方面，“杜门谢客，日以著述自娱”^⑩开始了一种以著述求自解的新生活，此后又四十年卒。这四十年间，李濂“博极群书，达观众品”，勤于著述，且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自为一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方志学及医史等，可称得上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著作家和学问家。

镇国中尉朱睦㮮、奉国将军朱安侃是万历年间周藩有名的学者，其时“人称睦㮮为‘大山’，安侃为‘小山’云”。朱睦㮮，字灌甫，号西亭，周藩镇平恭靖王四世孙，自幼端颖，“郡人李梦阳奇之，及长，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从河、洛间宿儒游。年二

① 《明史》卷 286，文苑二。

② 《空同先生集》卷 67，附录一，朱安侃：《李空同先生年谱》。

③ 《明史》卷 286，文苑二。

④ 朱睦㮮：《皇朝中州人物志》卷 13。

⑤ 《明史》卷 286，文苑二。

⑥ 何景明：《大复集》卷九，《李户部梦阳》。

⑦ 《明史》卷 286，文苑二。

⑧ 《光绪祥符县志》卷 16，人物，文苑。

⑨ 《明史》卷 286，文苑二。

⑩ 《光绪祥符县志》卷 16，人物，文苑。

十通《五经》，尤邃于《易》、《春秋》。”“通怀好士，而内行修洁。”^①筑万卷堂，“日讽诵其中”，论者比之汉朝刘向。著有《五经稽疑》、《授经图传》、《韵谱》、《明帝世表》、《周国世系表》、《建文逊国褒忠录》、《河南通志》、《开封郡志》等书，可谓读书博洽、著述等身之士。朱安侃，字思甫，周藩镇平府奉国将军，“笃行好古，于学无所不窥，所居建青藜阁，藏书数万卷，日诵读不辍，……晚年宗阳明先王文学，与海内诸名宿相交游。”^②所著有《理学寤言》、《太极图考》、《古本大学》、《续谈艺录》、《春草斋集》、《江山揽胜集》、《鸥汀渔唱集》诸书行于世。

由此可见，明代开封文坛上可谓群星璀璨，对此，清初诗人潘耒曾作诗赞曰：“中州才俊旧如云，雄笔空同迥绝群。嵩渚文章潮海富，苏门诗句惠兰芬。史编损仲成新囊，经籍西亭纂堕闻。”^③

入清以后，开封仍是“人文蒸起，其可传而可载者，尤彰彰入耳目间也，不亟表章。”^④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明末清初学者周亮工及常茂徠、宋继郊等人。

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海内称为栎园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他少负奇气，博极群书，明崇祯十三年中进士。入清后官至户部左侍郎。“亮工古文词根柢磐深，一禀秦汉遗轨而独癖性灵，未尝章规字范，索之象貌也。”^⑤周亮工平生著述甚富，尤其关心搜辑地方文献，所著有《赖古堂诗文集》并纂述数十种行于世。其子周在延、周在浚都有文名，在延著有《摄山园诗集》，在浚著有《大梁守城记》、《汴梁野乘》等著作。

常茂徠，字逸山，号秋崖，是清代开封文化史上一位著名学者。他“幼慧嗜学，作字不工辄掷笔泣，读书不熟即拥被弗眠”，其后年龄稍长，便“博通五经，诗文援笔立就。”^⑥道光五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此后便屡试不遇，便专心著述，对经史皆有独到论解，尤长春秋，精于考据。善书法，求其书法者接踵而至。好收藏金石，一时谈艺者共推为祭酒。以力佐官军守城有功被授予教谕，加五品衔，赏戴花翎，历任偃师、登封教谕。此后致仕归家，杜门谢客，以读书教子为事，同治十三年卒于家。常茂徠一生只任过教谕，故非常清闲，除寻访古迹、游山玩水、收藏金石之外，有大量的时间用于读书和著述，因此他一生著述颇多，留下的著述多达20余种，可谓开封历史上又一位高产的学者。其弟常茂绩，号槐街，亦有文名，“嗜学不倦，自经史百家及星历阴阳术数诸书无不读，必究原本，”^⑦著有《周易补象》、《毛诗鸟兽虫鱼草木集解》、《左

① 《明史》卷116，诸王传一。

② 《康熙开封府志》卷26，人物三。

③ 潘耒：《遂初堂集豫游草》，转引自宋继郊：《东京志略》，P129。

④ 《顺治祥符县志》卷6，文苑。

⑤ 《光绪祥符县志》卷16，人物，文苑。

⑥ 《光绪祥符县志》卷16，人物，文苑。

⑦ 《光绪祥符县志》卷17，人物，名宿。

传筮辞解义》、《读书偶得》、《臆见随笔》、《汴梁建置规模辨正》、《闺训》、《学吟庵诗草》等书。

宋继郊，字述之，号梅花道人，是继常茂徕之后，开封文化史上又一位学者。他“幼慕武虚谷徵君之为学”，拜清代考据派著名学者钱仪吉为师，勤奋读书，故“博学能文”，中道光二十四年举人，但此后却“数上公车不遇”。仕途不顺，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此，他对科举做官就心灰意冷，开始在开封城里设学馆教授生徒，同时从事学术研究。咸丰八年因协助官军守城有功，被授予许州州学学正。后来，相继任汝宁府府学（因丁忧未赴任）、陈州府府学、南阳府学教授等职，其中以在南阳府学时间最久，达二十余年。宋继郊从二十四五岁开始教书生涯，一面“以古迪士”，一面“笃行好学”，勤于著述，数十年如一日，终生不辍。因此他“著述称博雅，在许有《许昌集》；在陈有《淮阳集》；在洛有《锦屏集》；在南阳有《九仙馆集》、《西淮集》；在汴有《居学斋文集》、《居学斋诗集》、《三国人物年岁考》、《东京志略》、《武虚谷年谱》等书。”^①此外，据光绪《祥符县志·经籍志》与《中州艺文录》记载，宋继郊还有十多种未定稿的著述。由此可见，宋继郊的著述是非常宏富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除上述以文学著称的文人之外，明清时期开封还出现了一批以书画闻名的艺术家，他们或工于书法，或擅长绘画，并留下了大量书画作品，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如明代开封著名的画家张路，号平山，“天性工图画”。^②少年聪慧，“见吴道子、戴文进所画人物、山水最钟爱之，时加临摹，肖其神，笔法苍劲，以画成名，”^③张路所绘的人物画，其时士大夫争以数十金购之，一时之间开封城内以李空同（即李梦阳）文，左国矾字、张平山画号三绝。《如梦录》中称，明代开封相国寺大殿内有碑一通，“上刻张平山画布袋佛，背面观音菩萨，俱李梦阳题赞、左国矾书，称为中州三杰。”^④其后人张似乎，“类乃祖风，惟嗜画，所绘山水画，时人尤珍之。”此外，还有张纪山，以画花卉羽虫重于世，与张平山齐名，时人相传曰：“前有平山，后有纪山”。^⑤明代以书法闻名的有周宪王朱有燬和左国矾。朱有燬的书法以楷篆冠绝一时，所临摹晋唐名贤法书极妙，世称为东书堂帖，时人多珍藏之。左国矾，能书，法自颜鲁公，气度宏伟、庄重，“左氏书法文崆峒”，其字与李梦阳的文章都成为名品，当时人得其只字片辞都视为宝。

清代开封以书画知名者有刘源、张捷闻、秦耕等人。刘源，字伴阮，官至工部郎

^① 《光绪祥符县志》卷16，人物，儒林。

^② 《康熙开封府志》卷30，人物，方伎。

^③ 《顺治祥符县志》卷5，人物，方伎。

^④ 《如梦录·街市纪》。

^⑤ 《顺治祥符县志》卷5，人物，方伎。

中。《祥符县志》中称他“天才超轶，能诗工书画，自钟、王以下八分行草临摹无不酷似，山水竹石兼擅诸家，又出新意，绘人物所作凌烟阁功臣图，气象英伟，服装瑰异，虽阎立本不过是也。至赏鉴之精、制作主巧，尤称绝伦。”张捷闻，字研存，乾隆年间岁贡生，“能诗，工分隶绘事，擅用指画”，所画“花鸟竹石无不毕肖生动”。秦耕，字砚农，他不乐仕进，嗜爱绘画，人称其画有神来之笔，亦“擅长人物花卉。”^①

（二）明清时期开封的文人生活

“大梁自古号名区，富贵繁华代不殊。”^②开封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来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明清时期，开封作为河南省会，乃一省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号称“中州甲郡”，是大小官员聚集之地，更是文人学子荟萃之所，他们在闲暇之时，常择一风和日丽的日子，或呼朋唤友，或携带家人，去探访开封的名胜古迹，吟诗作对，发思古之幽情，或游山玩水，纵情于山水之间。正如刘醇笔下所写的那样：“汴昔輶轂之地，名园胜境甲于四方，每遇良辰佳节，往往为士大夫游观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余，所存无几，又河水湮没，若金明池、蔡太师湖之类亦泯然无迹可睹，惟城东南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独存，挺出风烟之外，高广数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台西有寺，民庐相接，竹木萧然，风景可爱。又东行六七里，临水有树，渔舟牧笛，野意超绝，比之台西，景物顿殊。”吹台风景如此优美，自然就成为开封人登临游赏的好去处。在风和日丽的春日，春光骀荡，草木争荣，鸟弄鱼游，士大夫们常邀好友一同前往，登临游赏之后，则“具酒肴，设几席，列坐于芳树之间，深杯迭进，清歌间作，众宾欢饮，”欣然自得，“恍然如在桃源深处，不觉世虑之俱忘也。”众人酣畅，日暮方归，“据鞍吟，欹醉帽，或语或笑，前后相续。”^③刘醇笔下的吹台，又名繁台、平台、雪台、梁台，在开封城东南三里许，相传是师旷吹律作乐之地，故名吹台。汉梁孝王增筑之，又名平台、梁台。谢惠连于此作《雪赋》，又名雪台。“繁”音“婆”，因此台靠近繁塔，故又名繁台。此台上有三贤祠，祀唐李白、杜甫、高适。天宝年间，三人聚于梁宋，共饮吹台之上，后人慕其高风，故建祠祀之。明嘉靖二年，河南按察使王濬登此台时，因感念大禹治水之功，饬有司建庙祀之，并嘱李梦阳撰文记之，故此台又名禹王台。吹台也因此而成为开封的一处胜景，吸引着在此为官或生活居住在开封的无数文人。如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文人，如李梦阳、左国矾、李濂、田汝耕、高叔嗣等人，亦常来此地，游赏之余或吟诗作对，或咏物抒怀，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如李梦阳的《吹台春日怀古》：“废苑迢迢入草莱，百年怀古一登台。天留李杜诗篇在，地历金元战阵来。流水侵城隋柳尽，行宫为寺汴花开。白头吟望黄鹂暮，瓠子

^① 《光绪祥符县志》卷17，人物，方伎。

^② 何景明：《大复集》卷11，《大梁行》。

^③ 《古今图书集成》卷386，方輿汇编，职方典，开封府部，艺文五，刘醇：《吹台春游序》。

歌残无限哀。”^①登临游赏之余，他们还常常以文会友，往来倡和，以文艺相磨切。如嘉靖年间，田汝耘、李梦阳、何景明、高叔嗣、左国玠、李濂诸子便结社倡和。李濂便有“髫年共结文章社”的诗句。嘉靖间开封的另一位文人李士允在辞官归隐后，终日闲居，“好吟咏，垂老不辍，尝与诸乡先生结怡情吟社，时相倡和。”^②此外，他们还常常以诗代书，往来互酬。如李梦阳访李濂后作《吹台访川父读书处》一诗，李濂便和以《吹台酬空同子见访之作》。李梦阳与何景明、左国玠、李濂、田汝耘诸人亦常有诗作互酬，或抒发对好友的思念之情，或互相探讨诗文创作。正如李濂在诗中描述的那样：“斜日梁王苑，西风鼓吹台。闭门秋思苦，走马故人来。啸咏依丛菊，扳留对晚苔。知君有高兴，凉夜不须回。”^③李梦阳的《空同集》，何景明的《大复集》以及李濂的《嵩渚文集》中都留下了不少他们与友人之间酬答寄赠的诗篇。对此，后人颇为仰慕，故此吹台的三贤祠又增祀李梦阳、何景明成为五贤祠。清乾隆二十九年，时任大梁书院院长的陈浩与开封太守刘标论明诗时，谈及五贤祠，认为苏门先生高子业（即高叔嗣）“与何、李两先生同时而独为淳古淡泊之诗，于举世不为之日，所谓鼓空山之琴待钟子期以听之者耶。”^④宜与李、何并祀，于是改五贤祠为六贤祠，此祠遂成为文人向往之地。

明末开封虽经水患，但禹王台仍“巍然独存，与繁塔相映”。康熙年间，官府屡次重修禹王庙，三十三年，康熙帝御书“功存河洛”四字，并特遣内阁中书穆东格、翰林院笔贴士米贵赉文，河南巡抚顾沅恭制匾额于禹王庙前，并创建御书楼奉悬于上，楼外四围建廊，随势曲折以供凭眺，此处遂为“中州绝胜之地”，重现了“繁台春色”这一胜景，故此处常常是“载酒多佳士，追欢及老翁”。^⑤康熙年间，河南巡抚李国亮曾于春秋佳日，邀同僚共登此台，劝农观稼，在前圃较射宴饮，以尽一日之盛，并作诗联句。有清一代，在开封任职的官员或邀同僚、或携家人，常登此台并作诗以记之。至今，禹王台公园内吹台的墙壁之上，还保留了不少清代官员游赏之后所题写的诗句。

此外，开封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曾是北宋盛极一时的皇都，在历经沧桑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古迹，如上方寺铁塔、繁塔、汴故城、州桥等，这些地方往往成为文人学子凭吊歌咏的对象，而著名的汴梁八景，即繁台春色、隋堤烟柳、汴水秋声、相国霜钟、铁塔行云、梁园雪霁、州桥明月、金池夜雨，更寄托了他们无限的遐思，他们抚今追昔，顿生沧桑变易之感，在登临凭吊之余，往往吟诗作赋，发思古之幽情，叹千古盛衰得失之故。正如康熙年间任河南按察使的胡介祉所说：“大梁，

① 李梦阳：《空同集》卷32，《吹台春日怀古》。

② 《光绪祥符县志》卷16，人物，文苑。

③ 李濂：《嵩渚文集》卷19，《秋日吹台读书酬左舜齐来访》。

④ 《续河南通志》卷80，艺文志，陈浩：《六贤祠记》。

⑤ 陈浩：《生香书屋诗集》卷6，《乙酉闰二月九日与书院诸子登吹台分韵得风字》。

古都会地，至今四方人士闻汴州名，辄作佳丽想，游履一到，寻胜迹，访故宫，兴不能自止。”^①他们登吹台，上艮岳，徘徊于荒烟蔓草之间，不觉神超忽，留下了不少怀古诗篇。正如清代开封诗人常茂徕在《古吹台赋》中吟咏的那样：“城南汴水去悠悠，百尺高台几度秋。台上人何在，台边水自流。一台落莫今如此，万古幽人几废邱。怀前贤而不见，望明月兮汴州。”^②

（三）明清时期开封市民文化生活

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状况推动了明清时期开封戏曲、曲艺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开封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呈现出绚丽多姿的丰采。

明代开封的戏曲特别发达，南北艺人流入开封很多。明初封藩开封的周宪王朱有燬，就是位著名的杂剧作家，他亲自参与创作，所作杂剧三十种，散曲百余，并常在开封一带上演。周王府长史牛恒便有“唱彻宪王新乐府，不知明月下樊楼”的诗句。清代诗人王紫绶在他的《大梁宫人行》中也曾吟到“宫中日夜闻箫鼓，记得宪王春乐府。”^③这些说明汴中演唱宪王（朱有燬）杂剧的盛况和南北艺人流入开封的众多。明代的戏曲有南曲、北曲之分，“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④可见，开封的戏曲在北曲中自成一派。明人沈德符曾说：“今世学舞者，俱作汴梁与金陵，太抵俱软舞”。^⑤可见开封还是明代“中原弦索”的“坛坫”，北方“软舞”的中心。

此外，明代中叶，开封盛行“时尚小令”。有人记载说：“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空同先生（即李梦阳）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何景明）继至，亦酷爱之。”^⑥至明末，开封城中有“大梨园七八十班，小吹打二三十班”，^⑦此外，还有许多中小剧场和散居各街道的清唱局，至于赶庙会唱戏的流动艺人更是数不胜数。每逢时令节日，城内各庙会便搭台演戏，大街小巷，按时不断。

明末至清初，戏曲艺术进一步发展。清代康、乾年间昆曲成为剧坛的盟主。乾隆中叶以后，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开封作为河南省会，是当时河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它地处中原，南船北马，群萃于此，因此成为地方戏曲集中的城市。以乾隆年间开封为背景的小说《歧路灯》中对这一时期的戏曲活动，作了精彩的描述，反映了当时开封戏曲文化的繁荣。

^① 《乾隆祥符县志》卷 20，艺文，胡介祉：《大梁杂咏序》。

^② 常茂徕：《怡古堂赋钞》，《古吹台赋》。

^③ 《康熙开封府志》卷 34，艺文四，王紫绶：《大梁宫人行》。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25，词曲。

^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25，词曲。

^⑥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25，词曲。

^⑦ 《如梦录·节令仪礼纪》。

通过《歧路灯》的描写，可知当时开封城中的上层人士，都非常喜欢昆曲。他们把昆曲视为“细戏”，城中很多官绅家中都养有昆曲班子。如小说中写一些州县官员“拳养戏班以图自娱”，小说第二十回中写按察司皂头张春山便供有两个昆曲戏班：绣春老班和绣春小班。此外，还有常驻开封的职业昆曲戏班，如小说中提到的有“福庆班、玉绣班、庆和班和萃锦班，都唱的好。”^①

《歧路灯》中除提及昆曲在开封大受欢迎外，还提到当时在开封活动的几种地方戏曲剧种，如陇西梆子腔、山东弦子戏、黄河北卷戏、山西泽州锣戏以及河南本地的土腔大笛嗡、小唢呐、朗头腔以及梆锣卷。这些地方戏曲取材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且戏演得很热闹，故而深受群众喜爱。

可见，其时上层人士沉醉于歌舞升平的生活，他们喜欢华丽纤柔的昆曲，而广大群众和市民却热烈地欢迎能够抒发他们思想感情的新兴的地方戏曲。戏曲不仅迎合了上层人士娱乐享受的需求，也符合广大群众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戏曲与各阶层人士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一种娱乐方式。

清代中叶以后，开封城内戏曲演出极为普遍。每逢节日必定演戏已成为惯例。正如小说《歧路灯》中所说：“省城是都会之地，正月乃热闹之节，处处有戏，天天有扮故事的。”^②若是没有戏，似乎就不象过年过节了。看戏不仅成为人们节日享受的一种方式，也成为群众闲暇时的主要活动。其时开封城内普通市民常看庙戏。庙戏在非年非节也有演出。《歧路灯》中就曾多次提到开封城内瘟神庙、山陕庙、城隍庙、大王庙、关帝庙、财神庙与天妃庙等处的庙戏演出。庙戏名义上是为了“娱神”，实际上却为普通群众提供了娱乐的机会，因此每逢庙戏，看戏的观众往往是人山人海。如《歧路灯》第四十八回写瘟神庙演戏，“看戏的人，挤挤挨挨，好不热闹。”^③第四十九回写山陕庙的演出，“更比瘟神庙演戏热闹，……不说男人看戏的多，只甬路东边女人，也敌住瘟神庙一院子人了。”^④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戏曲已经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它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明清时期，开封的说书、弹唱、杂耍表演等曲艺活动亦有发展。曲艺在开封源远流长。北宋东京的“瓦子”里就有小说、小唱、诸宫调、说浑话等曲艺活动。明清时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曲艺活动又有发展。据《如梦录》记载，明末开封城

^① 李绿园：《歧路灯》第95回。

^② 李绿园：《歧路灯》第8回。

^③ 李绿园：《歧路灯》第48回。

^④ 李绿园：《歧路灯》第49回。

内有许多以说书、弹唱为生的艺人，或流动表演于街头，或在茶馆酒楼卖艺。在商业繁盛的大相国寺中，“每日有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又自按察司街往南街东，有“小书、时画、算卦、相面、戏术”。在开封的五门小市，除日用百货贸易极盛外，“平时，又有占课、相面、算卦瞎子、女先弹唱”。^①清代开封城内说书、弹唱、杂耍表演等曲艺活动亦很活跃。如小说《歧路灯》中描写开封三月三禹王台庙会，其中便有曲艺表演，“走软索的走的是二郎赶太阳，卖马解（指马戏）的卖的是童子拜观音，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弄百戏的弄的是费长房入壶，说评书的说的是张天师降妖，端的夸不尽武艺高强。”^②可见，在杂技表演上，开封的艺人也达到了精湛的境界。

明清时期开封城内市民生活除看戏、听说书、弹唱点缀外，一年之中，各个节令都要举行一些民俗活动，这些活动亦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据《如梦录》记载，时代开封人过年时，“有天地神棚、家堂神圣、供养祖先门神、春联、黄线、吊麻、百事大吉、钟馗、富灰、挡众木、千斤石、苍术瘟岁圪塔、避瘟丹、芝麻秆撒岁、火炮惊瘟、蒸食、肉菜、果品等仪。”民间百姓则互相贺节、交拜、筵宴。大年初一后，则赴相国寺、箫墙街、听谈古，说因果，游乐。儿童有投核桃、掷钱等游戏。初八，人们要赴东岳庙进香游玩，是日东岳庙火烟繁茂，热闹非凡。初九日以后，俱赴上方寺，“携榼担酒，或在树阴，或在禅室，或在五柳亭，或塔左右，畅饮讴歌、打谜、猜枚、行令、拆牌道字、顶针续麻，丝竹管弦声盈耳。或于台下走马射箭，亦有酒饭茶汤铺，亦有戏棚杂耍。又有杂货、耍货，终日游乐，至暮方散。”^③至迎春日，男女看春，各戴春花、春鸡、蝴蝶之类，充衢溢巷，拥挤不动。至十五日，上元佳节，开封有赏花灯、放花炮的习俗。明代周王府的菜园内，扎架鳌山，高结彩棚，遍张奇巧花灯，不啻万盏，辉煌炫目，有如白昼。是夜，则丝弦竞奏，舞旋、扮戏、吊对倒喇、胡乐，热闹非常。烟火架上，则安设极巧故事，纵放走线兔子，有火盔、火伞、火马、火盆、炮打襄阳、五龙取水、牌坊等名，燃放时，花炮声震耳。明代开封城内诸王府、乡绅家俱放花灯，宴饮。各街庙宇俱有灯棚，各家俱放花炮，门前俱点门灯，争放花炮。上方寺铁塔上也遍点灯盏，一次仅用油就达五十余斤，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开封府两学宫前，“俱有高照花灯、花炮、起火、水兔子入水穿波，随风赶人，有赛月明、高处响炮、下垂拘挛，九条龙取水、九转高陞，各样奇巧。”^④大街上，游人携酒鼓吹，施放花炮，或团聚歌饮，打虎、装象、琵琶随唱、胡抱倒喇，街中男妇成群逐队。至夜里二更，城内巨室大家宅眷出游，僮仆执灯，侍婢妾媵，冉冉追随，徘徊星月之下，盘桓灯辉之中，……如此三夜，金吾不禁，任意游乐。一直待残月西沉，夜

^① 《如梦录·小市纪》。

^② 李绿园：《歧路灯》第3回。

^③ 《如梦录·节令礼仪记》。

^④ 《如梦录·节令礼仪记》。

東人散，方各自归家。此情此景，正如开封人李濂在《甲辰元夕》一诗中所吟咏的那样：“宝玦金貂簇繡鞍，倾城士女竞追欢。宣和旧俗灯偏盛，汴水新春夜不寒。人海涌来喧笑语，车雷轰处恣游盘。太平景象君须记，天汉桥边立马看。”^①节日期间，各街还有灯市，自初十开市，出卖各样奇巧花灯，还有纱人、耍货，铺面铺设至一二里。大诗人李梦阳在《汴中元夕》一诗中也写道：“四海烟花逢上元，中州行乐竞千门。大江不辨鱼龙戏，珊瑚宝玦是王孙。”^②这些诗句形象地展现了从周王府到民间各街道上元灯节的景象，勾勒出一幅锣鼓喧天，焰火辉煌，彩灯满衢，士女如云，载歌载舞的绚丽的上元夜景。二月十五日在花朝节，家家出门赏花，有碧桃、红梅、瑞香、月季、蔷薇、荼蘼、迎春、丁香、紫荆等。四月初五清明之日，城内王宗、乡绅、士庶人家，则各备香烛、纸锭、祭品上坟拜扫添土。郊外，轿马车辆载道，男妇携幼盈野。此时正值春日，城内王孙公子或乡绅士庶常到城外禹王台踏青游玩，小儿则放风筝，此为郊外一景。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城内百姓家家门悬艾虎，插彩艾、菖蒲，供雄黄酒、茱萸薄酒，用硃砂、雄黄点小孩耳及口鼻，以避五毒，吃角黍与油馓、腊肉、鸡、鱼、开坛豆头、备翁菜馨。此日，城内人亦有携酒赴繁塔寺、禹王台、九仙堂各处游宴。此时正值百花盛开，市民也常外出赏花，花的品种繁多，有芰菱、荷花、玉兰、榴花、茉莉、玉簪、水红、木香、铁角海棠、翠鹅眉、百日红等。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家家虔设清供月饼、西瓜、素肴、果品、毛豆等类，请客饮酒，名曰“西瓜会”。九九重阳这天，各家俱蒸发面花糕，纷纷外出登高宴客，玩赏丛菊。十二月初八日，俗呼“腊八”，此日，大小人家，俱煮果粥，谓之“腊八粥”。此外，每年之中清明、中元（七月十五日）、十月朔，俱是鬼节。开封城内则“预先请城隍行神至孤魂坛；请府城隍西门外孤魂坛；请县城隍宋门外孤魂坛。僧道发文，设坛礼忏，诵经荐拔一切孤魂，伏乞显圣尊神，传谕远近地方枉死冤魂，至期赴坛听宣法言，早登净土，免堕幽冥。施食毕，各官回衙。众会预修旗旛、法驾、文武仪杖、敕印等物，提炉香盒，龙灯高照，摆列队伍，传锣清道，大吹大擂，细乐喧天，送神归庙。……县城隍亦如之。”^③届时，城内无论男妇老幼都出门看赛神。

入清之后，这些传统的节令礼仪及民俗活动，大多保留了下来。清人周劭曾这样写道：“一湾绿树禹王台，时节清明花正开。相约邻家诸姊妹，明朝城外踏青来。三月晴和上巳天，东风吹暖绿杨烟。游人来往浑如织，争向城头放纸鸢。胜会城隍每出巡，家家酬愿赛明神。满城枷锁香风动，多是深闺善女人。”^④清康熙年间任河南按察使的胡介祉在其《禹王台记》中对当时开封人到禹王台踏青的盛况进行了描述，“台之上天

^① 李濂：《嵩渚文集》卷27，《甲辰元夕》。

^② 李梦阳：《空同集》卷25，《汴中元夕》。

^③ 《如梦录·节令礼仪纪》。

^④ 周劭：《瓶城山馆诗钞》卷9，《汴梁竹枝词》，转引自宋继郊：《东京志略》，P687。

章焕若；台之中神灵赫若；台之下士女纷若，踵事增华而游观日盛也。”^①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给明清时期开封市民带来了不少乐趣，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故深受百姓喜爱。有些民俗活动保留至今，并仍时有举行，显示了无穷的生命力。

（四）明清时期开封的宗教与祠祀活动

1. 明清时期开封的宗教

宗教与人类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它深深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一直绵延不绝。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真正迎合统治者需要并广泛流行的宗教之一，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得到民间普遍的信仰。至明清时期，佛、道两教经过漫长的发展，已日渐世俗化，其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佛、道两教的信仰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此外，明清时期，佛教信仰、道教信仰及民间信仰相互混融的现象已十分明显。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各种信仰常常是搅成一团的。他们求神拜佛、磕头烧香，主要是为了求得来世的幸福，解决现世的问题，所以见佛辄拜，遇仙则求，水陆道场也罢，斋醮祈禳也罢，反正都差不多，只要能够灵验，信仰对象分属几个阵营，他们都不在乎。总之，佛、道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氏之学盛于两河，开封为省会重区，梵宇元宫壮丽特甚”。^②明清时期，开封的佛、道宗教活动都较兴盛，城内分布着不少寺院、道观。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开封大小寺院共计四十余座，道观十余所。据此便可想见其宗教活动之盛。

开封城内著名的大相国寺，是城内最古老，也是规模最大的寺院。人称其为“中原之首刹”，乃“历朝祝国裕民之胜地，累代阐扬宗乘之名区也”。它创建于北齐天保元年，初名建国寺，后遭兵毁。唐睿宗时重修，“阔其宏观，其址七进，约有五百四十余亩，崇其梵宇大殿九楹，共合八十一间”，^③赐额相国寺。宋太宗至道二年重修并亲自题额曰“大相国寺”。其后，宋真宗、宋神宗、金章宗及元世祖时相继修建。元末毁于兵燹。明洪武二年敕令修复相国寺，十六年置僧纲司于内，负责管理全城的佛教事务，此后屡加修葺。成化二十年改敕赐“崇法寺”。嘉靖三十三年，周藩特加修葺，建资圣阁。有明一代，相国寺为中首诸刹之首，该寺全盛时，“灯烛之焰上达层霄，钟梵之音远闻数里；黄幡丹幢臂系而首载。香纓宝珞，穀击而育摩。”寺内佛象庄严，“都人士女缤纷杂沓，莫不耸然敬跃”。明末相国寺毁于水，“璇题碧甍，鳞次翼舒者，俱化为黄沙白草。”^④清初，因相国寺乃“阖省之观瞻”，遂议修复。顺治十八年，河南巡

^① 《康熙开封府志》卷37，艺文七，胡介祉：《禹王台记》。

^② 《康熙开封府志》卷19·寺观。

^③ □□□：《释真诠纪录》，转引自宋继郊：《东京志略》，P548。

^④ 《康熙开封府志》卷19，寺观，刘昌：《重修相国寺碑记》。

抚贾汉复倡议捐钱修复，并首捐千金，于是“鸠工庇材”，修复了大殿等建筑，相国寺逐渐恢复了昔日的雄壮。康熙十年建藏经楼。至乾隆三十一年，河南巡抚阿思哈题准动用库银一万两对相国寺进行重修，历时两年多，颇具规模。寺内有山门、钟鼓楼、接引殿、大殿、罗汉殿，最后为藏经楼及观音、地藏二阁。西院有各配殿以及戒坛方丈。寺西南建“祇园小筑”，有园楼之胜。重修后的相国寺，占地面积“五顷四十亩，南至祥符县治东街，北至鼓楼西街，东西至两马道，东马道北抵鼓楼，西马道邻县署，马厰四周红墙。”^①布局严谨，殿宇宏丽，浑然一体，在中原诸刹中盛名不衰，成为开封乃至中原地区的佛教胜地和佛教活动中心。除相国寺外，明清时期开封城内还有诸多名刹，如上方寺、宝相寺、孝严寺等，亦不断得到官府的修复。在修复开封原有寺院的同时，明清时期开封城内还新建了一些寺院，如万寿寺、兴国寺、隆兴寺、拈花庵等。从明清时期开封城内寺院之多，僧尼之众，不难想象其佛事活动之盛。

明清时期开封城内道观虽不及寺院多，但亦有像延庆观这样规模较大的道观。延庆观，本为元朝著名的“大朝元万寿宫”之斋堂。万寿宫乃元世祖时全真教盘山栖云祖师王志谨所建，规模宏伟。元末时，万寿宫毁于战火，惟存斋堂。明洪武六年恢复道观，改名延庆观，并重修殿宇，置道纪司于内，负责管理城内道教事务。此后，明永乐、成化、万历年间相继修葺。明末毁于水。清康熙七年，邑人赵行足募钱对道观进行了修复。道光二十七年，河南布政使王简重修。观内建筑自南向北有吕祖殿、三清殿、玉皇阁，阁东为三宫殿。除延庆观外，明洪武二十二年，又在城内府治西南建祐圣观。正德初年改额曰大道宫。明末河水淹没。清初道人康福臻募修，移建于永宁王府旧地。康熙五十八年，河南巡抚杨宗羲重修。另外，还修建了玉阳观、延祐观等道观。

明清时期开封城内分布的大大小的寺院、道观多达四十余处，由此便不难想见其时城内佛、道两教活动的盛况及其对城内市民生活的影响。

明清时期，开封还有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一赐乐业教、基督教等。这些教派也在城内建立寺院，宣扬本教的教义，并广收信徒。宋元时期，伴随着大量回民从外地移居开封，其所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亦随之传入开封，并建立清真寺以传教。明永乐五年，敕赐在府城东岳庙前路西重修清真寺，占地面积十余亩，规模宏伟。明末寺毁于水患。清顺治十二年掌教曹明、教人郭鹿鸣、李尚仁等重返故里，倡众捐资重建清真寺。道光二十年，寺院又被水没，道光二十六年再度重修。此即今开封东清真寺。除东清真寺外，现今开封市内另几处著名的清真寺，如善义堂清真寺、文殊寺街清真寺、草三亭清真寺等，大多也是明清之际修建的。

一赐乐业（即以色列）教是明清时期居住在开封的的一支犹太人所信仰的宗教。

^① 《新修祥符县志》卷13，祠祀，寺观，常茂徠：《相国寺纪略》。

“犹太教为一种民族宗教，与由异族集合而崇奉之宗教不同，故其种族所至之处，即为其宗教所布之处。”^①一赐乐业教来自万里之外，足为开封宗教的一大特色。据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的《重建清真寺记》碑记载，北宋时一支犹太人，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这支犹太人从此后便在开封定居下来。大约经过了半个世纪，他们在开封开始了安定的生活，并渐次开展起自己的宗教活动来。“宋孝隆兴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公元1163年），列微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公元1279年），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他们取“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之意，将自己的寺院称为清真寺，将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称为一赐乐业教。

由金、元，至明，开封的犹太人继续生息繁衍，“教众日益蕃衍”，故其寺院也屡次修葺。永乐十五年教民俺诚医士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正统十年，教民李荣、李良自备资财，重建前殿三间。至天顺五年，河水淹没，基址略存，教民“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札付等因至元年古刹清真寺准此。李荣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粧成，焕然一新。”成化年间，教民高鑑、高锐、高鉉、自备资财、增建后殿三间，并安置道经三部，外作穿廊，连接前殿。弘治二年，教民又捐资修寺，“诸氏舍公帑、经龕、经楼、经卓、连笼、栏杆、供卓、付簋诸物器皿，亦为彩画饰周围之用，壮丽一方。”正德七年秋重建寺院，“俺、李、高、维扬金溥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其时，将寺名易为尊崇道经寺，以自别于回教之清真寺。又因其教民在食牛羊肉时必先剔筋，故开封人给称其教为“挑筋教”。“正德以后，其教浸盛”。至明末寺中已有道经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道经由四部增至十三部，则其教众之多亦可想而知。明崇祯十五年的大水致使寺院及寺中所藏犹太教经卷均遭损坏，开封犹太人亦有半数罹难，“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但仍派人入寺捞取经卷，共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清顺治至康熙初年，开封城得到恢复重建，汴人复业者日益繁，犹太人迹返回开封，“教众虽安居于垣，终以汴寺之湮没为歉，”“惧寺废而教众遂涣散莫复也，目不忍以祖宗教百年创守之业，而忽废于一旦也，”故而教众公议捐资修复寺院，并由贡士高选等具呈各衙门请示，按照古刹清真寺准复修理，遂重建前殿三间，后殿三间，教祖殿三间，圣祖殿三间，北讲堂，南讲堂三间，大间三间，二门三间，厨房三间，牌坊一座，行殿九间殿中立皇清万万岁龙楼一座，焚修住室二处，“丹堊黝漆，壮丽辉煌”，“寺之规模，于是乎成，较昔更为完备矣。”其后康熙十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又重修寺院，规模日益扩大，康熙四十一年，罗马教士郭氏至开封，对开封一赐乐业教的情况有所记载，“开封有犹

^①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以下有关开封一赐乐业教所引资料均见此文。

太教寺一，为豫省大府奉诏所修。教众凡二三千人，群呼为挑筋教徒。”清道光、咸丰以后，开封犹太族日益衰落，寺亦日渐倾圮，道光二十九年河水泛滥，开封犹太寺被冲毁，但尚未全毁，犹太人尚有三百余名，但已无能诵希伯来文者。至咸丰初年，寺址虽存“然栋折榱坏，尘封积埃。”咸丰十年，河水复滥，寺院再遭毁坏。至同治六年，美国传教士丁匙良至其地，“则寺已鞠为茂草”，“片本无存，祇见二碑矗立”，虽有古经数卷，但已“无师讲诵，亦无礼拜，亦无所谓割礼，遗属七姓，人约四百，贫苦不堪，归回教者有之，与汉人同化者有之。”光、宣年间，即使是开封人也不知犹太寺所在何处，其地改为挑筋教胡同，已是瓦砾丛杂。犹太遗民存六姓，人口约近二百，多操小本营业。至1919年，开封犹太人，妇孺共计尚有一百二十余人，成丁者约三十人。^①开封一赐乐业教清真寺“始建于金，始修于元，历明迄清，凡五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创建最早，保持时间最长也是中外最为著名的古代中国犹太人的礼拜寺。明清时期开封一赐乐业教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繁荣和衰落。

2. 明清时期开封的祠祀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古圣王重之”。^②祭祀活动同其他政治制度一样，都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皇权至尊，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因此，祭祀活动深受统治者的重视。明太祖朱元璋便宣称“朕闻天生民而立君，君为民而立命，所以谨百神之祀乃国之先务也。”^③为了保证祭祀活动的神圣和庄严，还制定了极为详细的祭祀制度，将祭祀天、地、社稷之神、先农、风云雷雨山川、文庙、武庙、文昌庙、城隍、旗纛等列入祀典。朝有庆典，必遣官致祭，且命有司官员以时修举，“盖国家为民锡福，故禋祀之礼备极精详”。^④至于民间祠祀，由于它所祀的或是自然环境中的日月山河、草木鸟禽，或是有德于民而又有灵于人的神，它们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最为接近，所以在民间一直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明清时期，开封的祠祀活动之盛甚至超过了佛教及道教活动，其时城内遍布的各种祠庙多达八十处，从种类来看，祭祀活动大体上可分以下几类：

①列入祀典之祭祀

明清时期，列入祀典的诸神包括：社稷、先农、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包括府城隍和县城隍）、郡厉、邑厉、文庙、武庙、启圣祠、文昌庙、旗纛、济渎等。“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我国家命祀通于天下，而尊者惟社稷、山川、夫子为然。夫匪山川无以兴云雨润泽万物，匪土原以生，匪穀无以生，匪夫子无以纲常教万世契德，校功卓

^① 以上内容参考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② 《顺治祥符县志》卷1，坛庙。

^③ 《明太祖文集》卷6，命功臣祀岳镇海渎敕。

^④ 《续河南通志》輿地志，卷13，坛庙。

卓乎。”^①这反映了其时人们对诸神的崇拜，也道出了这些祭祀活动的重要性。对这些载入祀典的祭祀活动，明清两代都规定了极为详尽的制度。如祭祀孔子，“教天下莫大于孔子，”^②故明清两代对先师孔子的祭祀都非常重视，各地均设文庙，以供祭祀，开封亦如此。明洪武三年即在城东南隅原宋国子监旧址上建文庙，地方有司官员每春秋祀事，每月朔望行礼，且规定了严格的礼仪程序。此后历代官府都对文庙不断进行修复，以保证祭祀活动的正常举行。

②祭祀历代圣贤、忠臣、贤士大夫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观念，谁生前造惠于民，死后便应享受祠祀。即所谓“若夫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御大灾捍大患，凡有功德于民，莫不俎豆而舐蠶之诚。”^③所以历代圣贤、忠臣、贤士大夫的亡灵应该享受人间烟火，“所以崇德报功”。明清时期开封便有大量的历代圣贤或有功之文臣武将的祠庙，以供人们祭祀。如禹王庙、信陵君祠、汉寿亭侯庙、岳武穆王庙、包孝肃公祠、十贤祠、名贤祠、历代忠臣祠、樊将军庙、尉迟将军庙、宗公祠、李公祠等。对历代圣贤、忠臣、贤士大夫的祭祀，反映了明清时期开封人对他们的崇敬。如禹王，是一位备受历代中国人推崇的古代帝王，“其治水之功，开天地之奇，立生民之命，至今庐居而粒食者，皆禹之德也。”^④开封在明清时期备受黄河水患的折磨，故而对禹王有着非同一般的崇敬。李梦阳所说“夫功者切乎灾者也。大梁以灾故，是故独庙禹。”^⑤明嘉靖年间，因开封屡遭水灾之故，为纪念大禹治水之功，改吹台之上的碧霞元君祠为禹王庙，以“食德报功，崇而祀之”，后又增建两庑，祀历代治水有功之名臣二十九人。入清后屡次修复，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御书“功存河洛”四字悬于此，以纪念大禹治水之功。水德祠中祭祀历代治水有功之人也逐渐增至三十七人。对历代忠臣、贤士大夫的祭祀，则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上这些贤士大夫及忠臣的仰慕，如包拯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包拯在任开封府尹期间，做了不少对当时及后世都有益的好事，为官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不仅在当时即很有名望，更赢得了后世百姓对他的无限尊崇，成为封建时代清官的典范。故明清两代，开封人建包孝肃公祠，以“祀其知开封时功也”。

③祭祀明清两代有功之官员或武将

明清时期，开封又陆续兴建了一批有功于河南或开封之文官、武将的祠庙（包括一些官员的生祠），以表彰其功，昭世后人，这类祠庙为数甚多。如名抚祠、庇民祠、明巡抚章焕祠、袁贞吉祠、徐国公祠、宋国公祠、贾公祠、田公祠等。此外还兴建了

① 《嘉靖河南通志》卷 18，祠祀志。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51，《更定祀典》。

③ 《嘉靖河南通志》卷 18，祠祀。

④ 宜思恭：《游禹王台碑记》，此碑现存禹王台公园古吹台西壁。

⑤ 李梦阳：《空同集》卷 41，《禹庙碑》。

不少官员生祠，如刘太府生祠、李公生祠等。这些人，或为明清时期有功于开封，或在开封任职其间造福于民，官声卓著，故后人均为建祠以祀其功。其中以明代巡抚于谦最为有名。于谦巡抚河南期间，为开封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下车伊始，“会官取银矿，将议立课，公较得不偿费，禁采，给民孳牧”，“境内水可渠可堰者，论民凿筑以资灌溉，民多获利”，“遇岁歉，则请宽积逋，罢冗征，鹵地民苦输额税，则请折布以纾之”，“教民树艺”，“兴学育材，尤加之意”。对于官员属僚，则“务先身率”，“贤者榜其治绩以示劝”，而不贤者“则按黜不少贷”。正统五年，“黄河徙啗，大堤势薄，府城上下惊惶”，于谦则“躬督筑以捍，患遂弓身。”其后又请人“范铁为犀，勒铭其背，以固永远”。后于谦被召还朝，“时豫民千余人诣阙乞留”。于谦被召入朝后，“汴民感公之惠，思公之德，相率建祠堤旁，尚公遗像，其内以与土神并祀有年，盖异公之功与兹土相为无穷焉。”^①于谦死后，开封人又请建专祠于府城西南隅，即“公之寓廨故址，”每岁春秋，有司致祭。皆因“公抚莅中州，前后凡十有八稔，厥绩历历可经，而弭河患尤足以见其感动天地，此豫民今昔所为，以建庇民之祠也。嗟乎，有官在治而人称颂之，崇奉之，固其有以得民，然非阿或曜，未必皆诚也。惟夫既去而犹思，既没而益慕，不忘者然后见其得民心之诚且笃耳。”^②其后又屡加修葺。清同治年间，邑人王思兰、刘作宪等倡议重修，门额题曰于忠肃公祠。于谦因有功于开封人民，故其祠也四时香火不断，寄托了开封人民对他的思念和崇敬。正如嘉靖年间开封人李濂在诗中所说：“使君嘉绩遍三河，汴土遗黎坠泪多。无限颂勋怀德意，春风吹入降神歌。”^③

④祭祀孝义、节妇烈女

明清时期，官府极力宣扬程朱理学，故此对孝义之人和节妇烈女大加褒扬，并建祠以祀之。即“国家以孝治天下，特著令典，名建忠孝节义祠于郡县，命有司岁时祀之，所以牖世觉民之意至深切矣。”^④

明清时期，开封亦有不少此类祠庙。如府城大梁门西北一里许便有一座六烈女祠，建于明正德十年，祀开封烈女陈氏、张氏、高氏、刘氏、王氏、张氏，明末河水没，清康熙七年，河南布政使徐化成将其改建于上方寺右。十三年布政使金鉉增祀祥符烈女王氏，改名七烈女祠。祠久圯，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重建于节孝祠后，又增祀烈女张氏。可见，对节妇烈女的祭祀得到了官府的大力提倡。此外，城内还另建有忠义孝弟祠。统治者利用此类祠庙宣扬忠义孝弟思想和妇女的贞节观。

⑤祭祀其它各类杂神

^① 《成化河南总志》卷15，集文，徐有贞：《庇民祠祭少保于公文》。

^② 《成化河南总志》卷15，集文，胡濙：《庇民新祠记》。

^③ 李濂：《嵩渚文集》卷34。

^④ 《续河南通志》卷57，人物志。

明清时期开封民间还祭祀为数众多的杂神，如金龙四大王、龙王、火神、二郎神、马神及一些行业之神等。由此这些神灵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最为接近，所以在民间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如开封民间祭祀火神，就因为“五行之中，火之用为最切。……民一日非火即无以饮，则代天地养物者也；一宵非火即无以明，则代日、月照物者也。”^①故明代开封城内有两处火神庙，到清代更发展至四处，显示了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作用之大和人们对火的崇敬。此外明清时期开封民间还祭祀一些行业之神。行业之神源于中国传统的尊祖观念和佛教的祖师崇拜。行业无祖师似无本之木，总要寻一个祖师来祭祀，于是就把与本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人物或神灵供奉起来，做为行业的保护神。明开封城内就有机神庙、盐神庙等。盐神为晋葛洪，因明清时期开封西北一带多为盐地，此处居民多业熬盐，故以葛洪为盐业之神，建祠以祀之。

综上所述，无论祭祀的对象是什么，都反映了明清这一特定时代人们的信仰心态。注重现实性和直接性是中国传统信仰的根本特点。人们敬神献神，是希望从中得到心理上的安慰或寄托。所以，这些祭祀活动对当时人们的信仰心理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结 语

通过以上对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各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开封在城市建设、城市交通、手工业、商业贸易及文化生活诸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历朝历代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为近代以后开封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如至今开封许多街道的名称仍沿袭明清时期的称呼，而保留至今的清代城墙、龙亭等建筑更为开封增添了几分古城的风韵。至于明清时期开封文人留下的丰厚著述，早已成为开封人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后人研究开封的珍贵史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明清时期的开封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摆脱中国传统封建城市所固有的政治性、消费性及寄生性的特点，这些特征的存在制约了开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开封这座古都在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故近代以后，开封城市最终一步步走向衰落。因此，研究明清时期的开封城市，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客观地了解明清时期开封的社会面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开封城市自身发展的特点，对今后开封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①《光绪祥符县志》卷12，祠祀，袁盛：《重建火神庙碑记》。

附录一：参考文献

- [1]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12。
- [2] 《明太祖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 《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影本。
- [4] 《大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明)胡濙纂修:《成化河南总志》,1986年河南大学图书馆据民国21年河南通志馆影抄本。
- [6] (明)邹守愚修,李濂纂:《嘉靖河南通志》,据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
- [7]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 (明)李濂:《嵩渚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 [9] (明)李濂:《汴京知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59。
- [10] (明)李梦阳:《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1] (明)李梦阳:《空同先生集》,明万历年刊本。
- [12] (明)何景明:《大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 (明)叶盛:《水东日记》,魏中平点校,中华书局,1980.10。
- [14]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2。
- [15] (明)朱睦㮮:《皇朝中州人物志》,明代史籍汇刊本,台湾学生书局,民国59年。
- [16] (明)张潮辑:《虞初新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 [17] (明)王士性:《广志绎》,品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12。
- [18]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9]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中国史学丛书本,学生书局,民国54年。
- [20] (明)张岱:《石匱书后集》,中华书局,1959,4。
- [21] (明)白愚:《汴围湿襟录》,民国年间石印本。
- [22] (明)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1959,12。
- [23] 《如梦录》,三怡堂丛书本。
- [2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4。
- [25] 《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80。
- [26]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2。
- [27] (清)李光壁:《守汴日志》,昭代丛书壬集补编本。
- [28] (清)周在浚:《大梁守城记》,痛史本。
- [29] (清)郑廉:《豫变纪略》,三怡堂丛书本。
- [30] (清)吴伟业:《绥寇纪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1] (清)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 [32] (清)彭孙贻辑:《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
- [33] (清)顾炎武:《日知录》,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1929,10。
- [34] (清)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12。
- [35]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
- [36] (清)汪介人:《中州杂俎》,三怡堂丛书本。
- [37] (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蒋子遗书本。

- [38] (清) 朱云锦:《豫乘识小录》,清嘉庆二十三年维扬王有耀斋刊本。
- [39] (清) 靳辅:《治河奏绩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0] (清) 傅泽洪:《行水金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1] (清) 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2。
- [42] (清) 李同亨、张俊哲修,马士骥纂:《顺治祥符县志》,1989年据天津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八年3本影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 [43] (清) 管竭忠编修,张沐纂:《康熙开封府志》,康熙34年刊本。
- [44] (清) 顾沂等修,张沐等纂:《河南通志》,康熙34年刻本。
- [45] (清) 张淑载编修,鲁曾煜纂:《乾隆祥符县志》,乾隆4年刻本。
- [46] (清) 田文镜等修:《雍正河南通志》,雍正13年原刊本,道光6年,同治8年,光绪18年、28年历次补修本。
- [47] (清) 阿思哈等修:《乾隆续河南通志》,乾隆32年原刻本,光绪28年补刻本。
- [48] (清) 和坤等撰:《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9] (清) 黄舒曷撰:《光绪祥符县志》,光绪24年刊本。
- [50] (清) 宋继郊编撰:《东京志略》,王晟、李景文、刘璞玉点校,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9。
- [51] (清) 龚柴:《河南考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52] (清) 贺长龄辑:《皇朝纪世文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
- [53] (清) 黄舒曷编:《中州名贤集》,清光绪19年刊本。
- [54] (清) 李绿园:《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12。
- [55] (清) 刘锦藻编:《皇朝续文献通考》,民国4年铅印本。
- [56] 《明纪》,国学整理社,民国24年10月。
- [57] 河南通志馆编:《河南通志稿》,民国32年版。
- [58] 《古今图书集成》,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中华书局影印。
- [59] 李时燦:《中州艺文录》,经川图书馆刊本。
- [60] 范文澜等编:《捻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5。
- [61] 陈垣著:《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6。
- [62] 单远慕著:《开封史话》,中华书局,1983,3。
- [63] 李长傅著:《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9。
- [64] 韩大成著:《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 [64] 开封市黄河志编辑室编:《开封市黄河志》,1991年。

附录二： 明清时期开封籍文人及其著述情况一览表

姓名	字 号	出 身	官 职	著 述
滕克恭	安卿	元至正二年壬午科进士		《春秋要旨》、《谦斋稿》
张 肅	希贤	洪武初举明经	秦王府长史	《学庸句解》2 卷
贾明孝	君锡	洪武初举明经	秦中宜川令	《四书救弊编》
赵 玘	云翰	洪武二十年丁卯科举人	刑部尚书	《伦父集》
周 溥		明初徙居汴中		《方法考源》10 卷、《药歌括》6 卷
刘 醇	文中	洪武三十年举儒士	长史	《菊庄集》、《白云小稿》
刘 安	元静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科举人	山东道御史	《资蒙置集》6 卷
朱 櫓			周定王	《救荒本草》、《药方汇编》、《甲子编年》
朱有燬	号诚斋		周宪王	《修禊贴序》1 卷、《东书堂集古法贴》10 卷、《诚斋乐府》、《乐府家训》
王 宇	仲宏	正统四年己未科进士	大理寺少卿	《厚斋集》
张 遂	文吉	正统九年甲子科举人	浙江盐运使	《祥符人物总志》《始后录》
和 维	振纲	景泰二年辛未科进士	浙江金事	《愚见纪忘》
岳 璇	文玘	景泰二年辛未科进士	金都御史	《仕优小稿》
王 鹏	万里	成化七年辛卯乡荐	湖广衡州知府	《洗冤叙述录》
杨 璉	用章	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进士	山东按察司金事	《弦斋稿》
李 环	佩德	成化十三丁酉举人	山东青州府通判	《训蒙三字经》

姓名	字 号	出 身	官 职	著 述
刘 昂	孟頫	成化间贡生	枣强县学训导	《四书粹议》、《诗经直解》、《书香窝里吟》、《兰谷诗文抄》、《楮庭遗思录》
张 贤	尧臣	成化二十年甲辰科进士	太原知府	《二渠巴语》、《名贤珠玉》
郑 鑑	尚宜			《续医说》10卷、《医书百朋》3卷、《杏花春晓堂方》4卷、《方法考》4卷
李梦阳	字献吉 号空同	弘治六年癸丑科进士	江西按察司副使	《空同集》
李 源	宗一	弘治九年丙辰科进士	湖广布政司参议	有文集若干卷
田汝杆	勤甫	弘治十八年乙丑科进士	湖广按察司副使	《水南集》8卷、《周易纂注》4卷、《采药集》10卷、《归田集》2卷
李 源	川父	正德九年甲戌科进士	山西按察司僉事	《嵩渚文集》100卷、《嵩渚外集》、《嵩渚续集》若干卷、《祥符文献志》7卷、《汴京遗迹志》24卷、《乡贤传》8卷、《医史》10卷、《朱仙镇岳庙集》12卷附录1卷、《汴京宛异志》8卷、《观政集》1卷、《乙巳春游稿》5卷、《稼轩长短句》
左国机	舜齐	正德十一年丙子科举人		所著有经、义、赋、颂、碑、诔、序、记、五言、七言诗各累万言
田汝林	深甫	正德十一年丙子科举人	兵部司马	《深甫遗集》
李士允	子中	正德十二年丁丑科进士	陕西宛马寺卿	《李氏山藏集》
李承恩	君赐	正德十四年巳卯科举人		《易大义》、《诗大义》、《书拾菴》、《学庸拾朱》、《孟子说》、《西铭定性书》、《太极图说》、《河滨目录》、《劄记存稿》
熊 爵	献子	正德十六年辛巳科进士	山东按察司僉事	《平真外史》、《熊乾州集》、《秋兴诗》
和 春	大龄		晋州学正	《雪台遗稿》20卷
高叔嗣	子业	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	湖广按察使	《苏门集》8卷

姓 名	字 号	出 身	官 职	著 述
王 教	庸之	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	南京兵部右侍郎	《中川遗稿》33 卷
高仲嗣		嘉靖五年丙戌科进士	广西府知府	《广元集》2 卷
郭风仪	舜符	嘉靖五年丙戌科进士	云南按察司副使	《均奕集》
张 恩	子推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举人	湖广黄州府同知	《真率饮记》
孟 淮	豫川	嘉靖十七年戊戌科进士	应天府尹	《入蜀稿》
曹 金	汝砺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进士	陕西布政使	《博川父集》
陆 束	道函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进士	贵州都匀知府	《陆道函集》
王用章	汝平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	礼部主客郎	《松云集》4 卷
朱安侃	思甫	周藩镇平府奉国将军		《理学寤言》、《太极图考》、《古本大学》、《续谈艺录》、《春草斋集》、 《江山揽胜集》、《鸥汀渔唱集》、《丛桂庄诗集》、《宗臣志》、《宁夏 定变录》、《北地年表》、《丛桂庄品题诗》、《牡丹谱》
朱睦㮮	灌甫、号 西亭	周藩镇平府镇国中尉		《五经稽疑》12 卷、《明帝世系表》10 卷、《周国世系表》2 卷、《述 国褒忠录》5 卷、《校定溢法》1 卷、《韵谱》5 卷、《朱灌甫集》20 卷、《宗学书目》8 卷、《中州人物志》8 卷、《河南通志》40 卷、《授 经图传》、《陂上集》
杨时宁	子安	隆庆二年戊辰科进士	右都御史总督宣大	《宁夏奏议》、《督抚奏议》、《三边图说》
张一桂	稚圭	隆庆二年戊辰科进士	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杂体》60 卷
张民表	林宗	万历辛卯科举人		所著诗累屋
张同德	昭甫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	工科右给事中	创修邑乘，甚著详瞻
王惟俭	损仲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进士	工部右侍郎	《遥连堂订王损仲集》6 卷
马体元	紫素	万历年间贡生	北直晋州县令	《马紫素集》8 卷
张仕俊	泂霞	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	北直盐山令	《泂霞集》6 卷

姓名	字号	出身	官职	著述
白 愚	惊凡			《汴围湿襟录》
张壮行	心孟	天启四年甲子科举人		纂修邑乘
张文光	谦明	崇祯元年戊辰科进士	清吏科给事中	《斗斋诗选》上下卷
李光墜	熙亮	生员	知县	《守汴日志》
周亮工	元亮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	户部左侍郎	《赖古堂诗文集》、《印人传》3卷、《闽小记》4卷
王紫绶	金章	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	浙江布政司参政	《知思堂文集》《知思堂诗集》
赵映乘		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	福建汀漳兵备道按察司副使	《四竹堂纪异》240卷
袁禧如	圣衣	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	庶吉士	《廿一史衡裁》10卷、《四书汇旨》、《五经汉宋通合说》20卷
王廷璧	昆良	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	陕西凉庄兵备副使	《珠树堂文集》10卷、《聚远楼诗集》8卷
闵派鲁	伯宗	顺治年贡生	溧水知县	《菱谿集》
王 郊	颌野	康熙年贡生	临海县知县	《临海集》、《灵江澄治录》、《成化录》
马士隲		康熙年岁贡生	内乡教谕	《补石仓诗集》4卷、修《顺治祥符县志》
周在浚	雪客	康熙年间贡生		《大梁守城记》、《汴梁野乘》、《天发神 碑释文》
周在延	龙客			《摄山园诗话》
张开弟	訥亭	康熙年附贡生	钱塘知县	《余事编》、《梦余谈胜》、《竹窗夜话》、《洗冤述论》、《瘴乡灯》、《苗音考》、《稽古瑣言》
张 琦	两如	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	户部郎中	《都门诗》、《八闽诗》、《畿辅诗》、《历游草》、《西浙诗》、《西江诗》、 《南江诗》、《中州诗》、《粤东诗》
张运通	丽瀛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进士	翰林院侍读学士	《四书讲义》、《书经辨疑》、《诗经疑志》、《三订喻轮集》、《荷薪堂文稿》
贾翼宸				《史氏双忠录》
李为淦				《紫杞录》

姓 名	字 号	出 身	官 职	著 述
周世绍	仲启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举人	兴安知府	《听松楼印谱》
李 坚	敬堂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进士	刑部广西司员外郎	《萱寿堂集》
刘廷镛	麟海	乾隆四十年丁酉拔贡		《澹泊斋诵芬集》、《麟海集》
张荣寿	绿岩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举人	遂平教谕	《绿岩诗稿》
钱 炤	抑之	乾隆岁贡生		《文法举一》
汪以镇	子安	乾隆岁贡生		《厚葬说》、《敬惜五谷新说》、《惠济河水利论》
王儒行	聘之	乾隆间恩贡	主讲陈留莘野书院	《四书音释》、《读史笔谈》、《惠济河辑说》、《破书楼诗文集》
何成炽	匡山	乾隆年岁贡生		《历代醇儒姓氏考》、《匡山集》
张南圭	吟庄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进士	江阴知县	《词坛学步诗稿》、《枣香村课儿草》
王庆澜	安之	嘉庆时诸生		《菱江集》
周之琦	稚圭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进士	广西巡抚	《金梁梦月词》、《珠巢存课》、《心日斋词集》6卷、《心日斋十六家词录》
张云行	湘帆	嘉庆十五年庚午科举人	四川知县	《衍河图雅言》6卷
王吉士	文之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进士	彰德府教授	《四书经注考证》、《四书集注诸贤考》、《字学偏旁音释考》、《周礼旁批》、《尔雅注疏辑要》、《昭明文选辑要》、《蒿堂诗文稿》
钱侍宸	号杏君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科举人	陈州府学教授	《好谈理学说》
刘遵海	聿南	道光二年壬午科进士	顺天府北路同知	《四书存参》5卷、《经义存参》、《刘观察诗文集》、《有深致轩集》
王懿德	绍甫	道光三年癸未科进士	闽浙总督	《王靖毅奏疏》、《公余瑣言》
倭 仁	号艮峰	道光九年己丑科进士	大学士工部尚书	《倭文端公遗书》
何裕承	福将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进士	礼部侍郎，四川提学	《强恕斋文集》
周沐润	文之、	道光十六年丙申科进士	江苏常熟知县	《柯亭子集》、《复素堂集》
郑敬抡	通甫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进士	翰林院编修	《水流云在轩诗文集》

姓 名	字 号	出 身	官 职	著 述
常茂铤	逸山	道光五年贡生	教谕	《增订春秋世族源流考》、《春秋女谱》、《春秋国都考》、《读左漫笔》、《读经琐言》、《增订三字经》、《两汉质疑》、《汴京拾遗》、《汴中风土记》、《汴梁水灾纪略》、《汴中岁时记》、《增订〈如梦录〉》、《广古今同姓名录》、《增补小名录》、《读两汉金石记补释》、《读中州金石专》、《祥符金石记》、《石田野语》、《三余偶记》、《槐南小记》、《一竿竹山房诗草》、《蒿下吟》、《归来吟》、《怡古堂文钞》、《怡古堂诗钞》
宋继郊	述之、树芝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举人	府学教授	《许昌集》、《淮阳集》、《锦屏集》、《九仙馆集》、《西淮集》、《居学斋文集》、《居学斋诗集》、《桐淮集》、《紫玉廷馆集》、《公车集》、《颍川集》、《三国人物年岁考》、《武虚谷年谱》、《五代史诗笺注》、《东京志略》、《邕乘备采》、《志略备选》、《祥符县采访手稿》、《祥符县志稿古迹志》、《相国寺志略》、《学斋随笔》、《杂物选德》、《梁苑志余》、《辑抄〈东京梦华录〉》
董琨塘	伯瑶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举人	主讲滑县襄城书院	《慎永堂诗文钞》40卷
杨升階	荇华			《友竹轩诗稿》2卷
王 桂	字小山			《大学不三字广诂》、《水灾日记》、《续守汴志》、《夷山偶记》、《酬应礼记》
常茂绩	槐街			《周易补象》、《毛诗鸟兽虫鱼草木集解》、《左传笺辞解义》、《读书偶得》、《臆见随笔》、《汴梁建置规模辨》、《正闰训》、《学吟庵诗草》
张丙英	号虎头			《观雨轩诗钞》、《晚翠轩笔记》、《梨花枪谱》、《姚江年谱纂录》
吕祥荣		诸生		《批解周易春秋大义》、《经史拾遗》、《音韵辨伪》
裴 雋	春桥			《逸叟画谱》、《吟药室诗文稿》、《算法》
田 欣	乙亭			《儒学存真录》10卷

姓 名	字 号	出 身	官 职	著 述
何 奎	苍庵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举于乡		《苍庵诗》
周星誉	韵叔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进士	两广盐运使	《日记》3卷、《沅堂诗》1卷、《东鸥草堂诗》2卷、《欧堂胜稿》
周星诒	秀颀			《三国志考证校语》、《藕耕诗》、《勉斋词》、 《岭南韵语录》
王树庭				
郝 隲	瑞泉	咸丰二年壬子科举人	知县同知	《周易俗说》、《劝世琐言》、《理学辨言》、《太极图说》、《寻孔颜乐处辨》、《朱陆异同》、《天籁集》
刘毓楠	南卿	咸丰二年壬子科进士	按察使	《澹泊斋谏草集》
冯瑞本	子立	咸丰六年丙辰科进士	广州府知府	《鸣秋集》、《读礼摘要》、《读汉随笔》
沈源深	叔眉	咸丰十年庚申科进士	兵部右侍郎、福建学政	《沈侍郎文集》、《士林模范》、《劝学浅语》
袁素珊		邑诸生		《静远堂稿》4卷、《四书阙疑》1卷、《课幼草小论文》6卷
许世信	仲孚			《皇舆指掌》、《家训编》
谢慎修	号朴园	监生		《谢氏砚考》、《东山园书录石本》、《谈往》、《自怡集》
张翊国	孟文		海盐知事	《扬州记事》、《承翠轩诗钞》、《友竹轩诗稿》
王 廉	介艇	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	直隶布政使	《大梁诗集》34卷、《后集》1卷
姜宗英		光绪十一年副贡生		《松石山房诗草》
常启佑		痒生		《医学心得》5集
刘 镛	东堂	诸生		《红杏山房诗》
左 贞	青岱			《布衣草》
马士骥	楫雪			《片石斋烬余草》
沈廷杰	汉三			《外科指南》、《奇症良方》